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07期

【思想文化】

“党文化”的特征与改造/郑永年

【百年中国】

南京十年：1949—1959

——从城市接管到农村大跃进/盛天任

画说我的一生/ 刘海鸥

15. 动摇的钢铁长城（上）

（1966年5月——1966年7月）

【评论】

试谈贾宝林的中举/ 刘瑜

人生难得糊涂 / 何与怀

【读书】

浮生羁旅渡残舟

——《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读后/ 启之

【序跋】

《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作者前言 后记/ 文伯

【述往】

农村的文革之火在燃烧/ 文伯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0）

——“开门办学”之四：1975年学工/李红云

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高晋占

折翼的老五届——从清华学子到阶下囚/曾文龙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党文化”的特征与改造

郑永年

一种积极正面的“党文化”有助于党的生存和发展，但一种消极负面的“党文化”则加速党的衰败。中国封建式的“党文化”无疑属于后者。如果任其延续和发展下去，这种“党文化”最终会葬送执政党的命运。只有通过大力改造执政党的“党文化”，去封建化，建设一种人人平等的法治“党文化”，才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拥有 9000 多万党员，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其党员的数量要比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但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面临着无穷的问题、挑战，甚至危机。这就说明，无论是领导层还是其党员，都没有担负起责任来。这里的因素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执政党已经发展出了不应当出现的“党文化”。

任何一个企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任何一个政党也都有其独特的政党文化，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政党文化，都是一种组织文化。如果它是一种积极的组织文化，那么，它就是这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软实力。如果它是一种消极的组织文化，那么，它就是这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负能量。我们这里所说的“党文化”是一种消极文化，是促使党衰败的负面文化。

如何来理解“党文化”的消极性和积极性、正面性和负面性？这问题主要看政党的性质。政党和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目标是执政，就是说，成为执政党是任何政党的使命。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就不是真正的政党。如果要执政，政党就要考虑其和社会的关系。一个脱离社会、不能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党是不能成为执政党的；同样，一旦脱离社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党文化”的正、负面并不难，那就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党和社会联系的文化，就是正文化和积极文化；而一种导致党和社会脱节和分离的文化，就是负文化和消极文化。

一、奴才文化

在中共的“党文化”中，存在着众多能够导致党和社会脱节和隔离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或者是文化核心，可以用一个常见的概念来概括，那就是“封建”。中国共产党经过了30来年的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阶级斗争，也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无论是革命，还是斗争，或者是改革，从理论上应当是“去封建化”的过程。

作为一种文化，中国的封建长达数千年，要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去除封建化也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但至少，人们可以希望封建化的程度越来越低。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封建文化随着革命、斗争和改革的过程延续下来，在不同时期“转世”成为不同形式。在一些领域，文化的封建性似乎越来越浓厚。

“党文化”中的封建性处处可见，把党的领导和下级官员隔离开来，把党和社会隔离开来。首先体现为一种封建的等级化。在任何组织内部，包括民族国家，等级性不可避免，也是体制运作的内在要求，但中共体制内部体现出过于浓厚的“奴才文化”。上级领导把下级看成“奴才”，一级、一级地往下传递。

中国的“党文化”中没有其它国家官僚体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重权威的文化，而体现为恐惧权力、献媚权力的“奴才文化”。当然，这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有恐惧或者献媚权力的传统，从来就没有尊重权威的传统。

“奴才文化”发展到一个顶点，下级唯一所想的就是要讨上级的欢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说假话。结果怎样呢？有人已经指出，党内说真话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当然，这里的说话并不仅仅局限于平常那些交往过程的谈话，更是体现在党内的各种领导人讲话、公报、政策等所有需要用文字来表达的文件上。“党八股”的文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只能从字里行间来解读其需要传达的信息。到了社会层面，这些文件谁也看不懂。当下级看不懂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上级的意图的时候，当人民看不懂执政党的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执政党意图的时候，相关各方之间的沟通就中断了，他们之间也就拥有了无形的“城墙”。

表现在实际政策行为中（无论是决策还是政策执行），这种文化表现为只“唯上”而不“唯下”。从统治者或者上级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下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在上级的政策意志和社会需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从而能够一方面从下级

那里得到反映现实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能够执行下去。但在“唯上”的文化里面，下级是不会考虑到现实情况和社会需要的，很多政策既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也不能得到执行。如果要强行执行，必然深化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走向统治者和上级本来意志的反面。“唯上”文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英淘汰”，就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又能够做事情的干部被视为异类，不能被上级和同事所接受。

二、帮派文化

与之相关的，是被称之为“秘书帮文化”的“党文化”。在任何制度下，秘书都是很重要的。但中国的秘书有其封建特性，有点类似封建时代的“家奴”。中国的秘书帮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对很多领导来说，什么都可以缺，唯独秘书不能缺。无论是本身的工作、外部关系，甚至家庭关系都需要秘书。如此高度依赖秘书，秘书简直就是一些领导通往外部世界的“必经通道”。换一句话说，秘书就是领导的“城堡”。在这个意义上说，秘书有效地把领导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

再者，秘书也是领导的“脑袋”。很多领导整日沉迷于琐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大问题，所以需要秘书来做其“脑袋”，秘书要替其所服务的领导思考，准备好领导所有的讲话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无怪乎有人说，秘书是领导的“领导”。在很多场合，秘书的质量就决定了一个领导人的成败。

更为重要的是党内毫无规则的权力竞争。在封建时代，没有政治竞争，因为王权具有高度垄断性，属于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不过，皇帝之下有变相的竞争，竞争产生于皇帝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在各级官僚。旧时有“朋党”一说。“朋党”就是政治竞争的工具。因为王权是垄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来制约甚至消灭“朋党”政治。

现在时代不同了，无论是高层的权力交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换届”或者“换代”，权力都比较分散。尤其在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不过，竞争没有任何明文规则。情况往往是，各方的权力争斗经常到白热化的程度。在地方层面，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导致党的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动真刀真枪，

甚至“暗杀”。同样，这样那样的“朋党文化”也盛行起来，干部中间的“山头主义”、“派系”、“帮”越来越盛。帮派之间的竞争也经常导致它们之间的不同形式的“火并”。这种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层面，对党整体的伤害可以是伤筋动骨式的。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政治竞争方式的任何好处，但要承担其负面后果，甚至恶果。在传统王权社会，宫廷斗争可以伤及社会无辜。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现代版本的存在。

三、缺乏人道主义精神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体现为党内人道主义的缺乏。无论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横向的政治竞争，都不能体现任何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级当人看；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竞争，必然表现为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性质。

“党文化”一旦延伸到社会，更造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对立。这里所说的“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文化，而是唯一执政党的“党文化”，是统治者的内部文化。统治者的这种内部文化，必然要影响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是党内的“非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执政党党内没有人道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自然也很难实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但中国的人本主义，

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人本主义，不管其哪种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员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儒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里面的主体仍然是王权，就是说王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因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这个群体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人民永远是一个被管制的客体。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人道主义永远只是理想，而成为不了现实。

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设计政治、社会各种制度。因为人人都性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样。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党内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会，表现为官员往往自认为是人民的老爷（或者是“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民主”）。实际上是把人民当成“奴才”。在党内，上级把下级当“奴才”，到了权力阶梯的最低端，基层干部在党内找不到“奴才”，就只好把平民百姓当“奴才”。拿老百姓出气、欺负人民的现象经常发展到“官逼民反”的程度。

中国社会上官员与社会、老百姓之间的日常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更是官员藐视老百姓的心态的直接反映。

在如此“党文化”影响下，很多党员不仅在党内的各种关系中，而且在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中，都表现为极端的自私。党员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利益，执政党不能超于自己狭隘的利益。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当党员和执政党整体不能超越其自私利益的时候，就必然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

问题在于，今天的社会毕竟已经和封建时代大不相同了。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封建式的权力“等级”还是“奴才文化”，都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是被社会和老百姓所接受的。但是，今天当人民和社会自己不认为是“奴才”的时候，当他们对政治和社会平等具有高度认同的时候，党政官员如果继续抱有封建式的“党文化”，其和人民、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积极正面的“党文化”有助于党的生存和发展，但一种消极负面的“党文化”则加速党的衰败。中国封建式的“党文化”无疑属于后者。如果任其延续和发展下去，这种“党文化”最终会葬送执政党的命运。也毋庸置疑，只有通过大力改造执政党的“党文化”，去封建化，建设一种人人平等的法治“党文化”，才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的道路。❏

【百年中国】

南京十年：1949--1959

——从城市接管到农村大跃进

盛天任

1949年4月23日深夜，作为国民党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中心的南京，终于解放了。

南京的解放，既不是天津模式，也不是北平模式，而是大军压境，敌人逃跑。地下党组织各条战线的群众纷纷起来，护厂护校，保护城市，里应外合，协助接管的。各行各业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坚守岗位，保护国家人民财产，与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作斗争，在国民党军警撤逃、解放军当时未进城的一段真空时期，南京没有大乱，保证了水电供应及电讯通畅，各机关单位的文书档案也基本保存。除了下关火车站候车大楼及司法行政部大楼（今供电局）被撤退前的工兵引炸（后被地下党控制的消防总队扑救）以外，城内主要建筑均完好无损。这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大城市的被解放恐怕是不多见的。

我于24日清晨天还没大亮之前，就奔赴下关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到挹江门时，已见解放军单兵行列进城，其余二门紧闭，并不像想象中或后来补拍的电影中那样热烈。但沿途群众夹道欢迎，队队学生前来呼口号鼓掌，表露了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我得到王明远同志的通知，暂不许暴露身份，保留原建制听候调遣。但按捺不住激动心情，汇文女中的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请饶展湘同志从中大工学院学生党员中找了一位叫王化兴的来替我代课，自己则尽情到处看看。先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到梅园新村瞻仰一下，因为过去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许走到那一带去的，怕被敌特便衣注意，就像《新华日报》的读报栏附近也是不许去的，但此时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可看，仅仅是到此一游表露我的心迹而已。

4月28日，市军管会成立，王明远任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我曾到成贤街原教育部旧址他的办公室访问过，见到了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白丁）同志、大专部部长赵卓同志，他们告诉我可能要到大学里抽调一些党员学生协助参加接管工作。我对赵卓同志说，你负责各大专院校的接管，你要调大学生还不容易？他说，不行，党的关系还在你下面，调人就必须通过你，这是“组织原则”。

5月1日，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召开了有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3000余人参加的会师大会。经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刘伯承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为常委，王明远也参加了市委，任青委书记。地下党各系统的党组织分别入新市委相应的部门和系统，我和学委仍归王明远同志领导。

隔了几天，王明远通知我，团中央李昌同志来南京筹建团市委，要我前去参加。我记得是5月7日上午，我到中山东路中央饭店二楼李昌同志住处开会，在座的有工委的高骏及其他人（不认识）。会议开了一半，说有电话找我，一接，是市委组织部的，说陈修良大姐找我，下午去报到。我只得向李昌同志告别。下午到中山北路原行政院大楼（市委常委临时办公地点）找陈大姐。她告诉我，调我到市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明天组织部就要搬家了，到牯岭路18号报到。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调朱启銮同志任组织科长，因朱要求去政府工作，故调我去了。

组织部当时只有十来个人，设两科一室，干部科长寿松涛，副科长王荣元，科员三人，组织科长就我一人，科员三人，办公室由夏冰流任秘书，下面只有文书、档案员各一人，还有一名勤杂员。我到任以后，对组织科该管些什么事，并不知道，只能问问解放区来的同志，说是管组织和党员的。就当时的情况看，应付门市就已经很忙了。一是随着干部调配和人员流动，接转组织关系，有专人（记得是徐漱华，后改由张道达）负责。一是自称是失去了党员组织关系的人前来要求接关系，所有这一类人，根据市委指示，一律不得随便表态，只是要他写下材料，并提出证明人，待查核后再作处理。这种人两个月先后大概接待了数十人。另有一批地下党员撤退到解放区或疏散到外地未及转党的关系（保留在学委是我经手的）的，找来后了解他离开南京后的情况，核查属实并没有发现问题的，就恢复了关系，介绍出去到他现在工作的单位。除了这些事情以外，组织科还要做什么工作，当时并不了解。

有次芜湖市委书记李步新同志（后在80年代曾任中组部副部长）来市委汇报工作（当时南京市委领导皖南、皖北和赣东北三个区党委），请示城市中如何设置组织机构问题，市委副书记宋任穷同志叫他找陈修良同志谈，陈大姐叫他找我。我接待后一头雾水，提不出什么见解，只能说这是大军进城后的新问题，各地可自行提出方案试行云云，白说一通，等于不说。

经历此事之后，我深感自己不能胜任，要求担任副职，另派解放区老做组织工作的干部来担任正职。我先同陈大姐谈，她批评我胆子太小，有什么不能干的？说不通。我就找寿松涛同志谈心，说明自己虽有搞好工作的愿望，但由于一直搞地下工作，组织形式主要是单线联系，视野较窄，很多事情不懂，恳请组织上派老区来的组织工作干部出任正职，我退居副职，以便边学边干，也免得耽误工作。寿向市委领导反映了我的意见，不久，派姚子健同志来任组织科长，我改任副科长。姚是豫皖苏六地委组织部长，抗战前在南京地质学校读书时入党，地下工作二三年后撤至根据地，从基层干起，一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他到任以后，许多大主意由他拿，我虚心向他学习，他则放手让我干具体工作，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1950年春，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说父亲自杀未遂，要我回家。我立即向寿松涛同志作了汇报，当时寿已升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听后似乎有些疑惑，说“土改”还没有开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中央对江南新区农村的政策是很慎重的，你快回去看看，是否基层干部有什么粗暴行为。他谈了1948年解放区“三查三整”时有些地区发生的情况（打翻身棍等），又问我，太仓县委是否有人认识？我说县委书记浦太福是我们岳王普帆桥人，抗战前在岳王小学工作，是我的体育老师，但以后没有联系，他也不知道我参加革命的事。寿要办公室写了一封介绍信，以市委组织部名义介绍我去太仓县委找浦太福同志，要我把了解的基层情况向县委反映反映。

我经上海到浏河，正值去岳王的班车才开走，要到下午才有车。我就步行走小路经新塘市回去，距岳王三四里时，遥见那株参天的银杏树屹立在杨林河堤上，那种“少小离家”、“乡音无改”的乡思油然而生。到家后，看到父亲卧床休息，是用剪刀绞颈动脉未破，只是损了一点皮，用纱布敷着，并无大碍。我问他为何出此下策，他闭眼摇头不答。我向母亲说，恐怕老毛病又犯了。我们想起了1937年夏天我和父亲到上海后，住在四马路附近一家旅馆中，他老听到隔壁人声是游击队跟踪来逼他要钱的幻听，想不通而在床上系裤带自缢的事。当时经陪同去沪的邻居王佩琴抢救下来，送附近的医院诊治，说是什么强迫症。但这次事前并无症候，乡镇基层干部也没有接触，不知是何原因？我只得正面加以劝慰，说只要遵纪守法，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中午，我在堂屋吃饭时，有两个镇干部前来，我向他们打了招呼，母亲请他

们便饭，他们稍一寒暄便走了。随后，我堂弟回来对我母亲说，外面传说，盛家的儿子官儿不小呀，穿的制服的口袋是斜的，而且还带了长大衣，一定是县团级以上干部。母亲听后非常得意，要用我的名义请镇上领导干部来家吃饭，被我严词拒绝。我决定取消到太仓县城找县委浦太福同志的打算。第二天一早，我仍由原路经上海回南京，向寿副部长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并交还了那封介绍信。寿向市委领导同志也作了汇报。

其间，市委机关发生了马浩然自杀及徐光回乡探亲扫墓鸣枪事件，颇受各方关注。¹

是年夏，市委组织部所属科改设处，我调任干部处副处长，高山同志来任处长。高一直在部队搞政工工作，一次作战中腰部负伤，又泅渡过河，使肾脏感染，留有残疾。他身体虽然不好，但非常敬业，领导水平也较高。他从来往干部中留下几名政工骨干，充实了处里的人员，除了应付门市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到调查研究上，分别到各部门去考察了解市管干部，研究进城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如何适应工作的需要和学习经济建设的新经验等问题。他对我工作比较放手，我也从中学习到不少新知识。由于工作的不断开展，全处上下充满了团结向上的气氛。

1951年春，我们家乡“土改”还未开始，突接建弟来信，说父亲被捕后不久即被镇压，主要说他畏罪自杀，抗拒“土改”。我得此消息后，立即向市委组织部部长邱一涵同志（陈修良大姐已调华东工作，邱大姐来接任部长）汇报，并主动提出请求调离组织部门，（中组部有文件规定凡直系亲属有杀、关、管的，不得在党委组织纪检等机要部门工作，我是知道的。）我愿意去市里某所中学担任副校长，认为还是可以搞好工作的。邱大姐向市委作了汇报，不久即告诉我，柯老、江政委他们对你在政治上是信任的，还提到了去年柯老在华东局开会时，要我带信回来给刘述周秘书长的事。那次柯在华东局开会，我也在上海办事，他知道我当天要回南京，就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记得是杜美路杜月笙公馆），写了一封信要我带给秘书长。我回宁后把信立即交给了刘，刘问我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刘看见信封并没有封口，有点诧异，说你没有看？我说，我长期搞白区工

¹ 马浩然，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家庭成分自报中农，当日家乡有人来告以他家已划为地主，他连声说“完了！完了！”遂于午后在办公室将自带的驳壳枪向脑门射击自杀。据他随同的通讯员反映，他每晚洗脚时有一只袜子从来不脱，经查，袜子内藏有纸条，上面写着：“要为县团级干部而努力！”徐光，市委政策研究室副团级调研员。是年春，回吴县东山老家探亲扫墓，要随行的警卫员到镇上买鞭炮，没有买到，就要警卫员用驳壳枪向天空射击多发，当地群众向市委举报，说他回乡鸣枪示威。

作，已养成习惯，不该知道的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他把信看后，就要我复写五份，分发给各个常委。原来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不久，为防美机来宁轰炸，拟将中山陵附近藏经楼收拾一下，作为市委常委办公备用地点。此事那时对我来说，是极平常的事，而他们却把它作为议论我政治素质的论据之一。邱大姐一再要我不背包袱，大胆工作，我也就安心留下来了。1952年夏，高山同志因病住院，直至不起，我就一人抓处里的工作，因为有了前一段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觉得太吃力了。

不久，中央决定恢复江苏省建制，由苏南、苏北两个区党委合并建成，南京市改为直辖市。筹建工作在年底前紧张进行。为了搭建省级机关各部门的领导班子，由苏南、苏北及南京市各抽一名干部处长，（苏南为沈建新，苏北为刘桂，南京市是我）组成工作组，由陈光同志（原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内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抓总，提出初步人选方案，交省委常委讨论决定。之后，新的南京市委成立，惠浴宇（原苏北行署主任）任书记，刘玉林任市委组织部长，我被任命为干部处长，另配一名副处长（先是李苏民，后为程箴敏）。在忙完了市、区两级干部调整配备之后，又忙着调配支援141项（后增为152项）干部的任务。这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工程配备的县以上干部的任务，大部分调任东北等重工业集中地区。我向刘玉林同志表达了想去东北参加经济建设的愿望，并买了一件胎羊皮大衣（直到现在，长大衣改为短大衣，但尚未穿过，压箱底而已），以示决心，但他一直没有同意。

1954年春，我调到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任专职副局长。按照当时的模式，人事部门的领导为四名，第一把手由同级党委组织部的一位部长兼任，第二位是专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第三位由同级党委统战部的一位部长兼任，第四位是安排党外民主人士。例如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的部长为胡立教，第一副部长为刘顺元（专职），副部长为陈同生和赵朴初。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局长为高黎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专职副局长为我，另一位副局长为王昭铨，但民主人士副局长一直未配。人事部门的职责是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从事任免市管干部，调配一般干部及工资福利统计等行政性事务，所以比起党委组织部门的干部处要清闲一些。当时市人事局设一科（管秘书、任免）、二科（福利）、三科（统计）。但当时正值党委将干部实行分管之际，市委组织部统管全部外，还

直接管党群干部，文教体卫干部归市委宣传部管，工矿干部归新设的市委工业部管，政法干部暂由市公安局政治处管，财经及市政建设两个系统的干部就暂由市人事局管，所以市人事局还增设了相应的两个科。

1955年夏，我调到市监察局任副局长，局长为刘咏菊，是一位老红军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为人正派，我和他相处得不差。另一位副局长是张士一，南师院教授，无党派民主人士，每星期来一两个半天，参加局务会议，不大管事。

监察局和市委纪委合在一处办公，合并成立一个支部，因此，政治运动就两个单位合在一起搞。我到任不久，反胡风演变成“肃反”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五人小组”没有要我参加（我知道上面有规定），我就分管抓业务。当时监察局的业务除执行“政纪”外，还根据苏联经验，开展了对经济建设单位的“事先监督”，从而可以有机会选择地了解工矿企业单位的经营情况，学习到不少经济知识。到了运动后期，却要我参加了全市的（公安系统除外）“甄别定案”小组，审查材料，弄清事实，注重掌握政策，对我来说，提高不少。

1956年春，市委副书记何冰皓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已被选为市第三届党代会代表，并要我到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56年6月，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部长郑康，副部长李善一，都是熟悉的，以后又先后增加了蒋静林、欧阳仪为副部长。我到宣传部后，每天要看的文件资料大增，显然要比前两年忙得多。第一次面向部里全体干部做的报告是动员工资调整，第一次面向全市干部的党课是讲解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一直分析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成因，因为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

正在我私自庆幸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时候，忽然又接市委通知，要调我到省里工作，据说是到即将成立的新机构——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邱一涵同志担任首任监委书记。我在到职之前先去看望了邱大姐，她正卧病在家，问我什么时候到省里来上班？我告诉她我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才上一点路子，怎么又调我到省里来了。她笑着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江苏召开以后，钱瑛大姐就向江苏省委要求调我去中央监察部工作。邱大姐还说：“早在1948年香港党训班期间，陈修良同志在总结汇报南京地下党工作时，钱大姐对你就有印象。这次她向省委提出要给你多压一点担子。”省委与南京市委商议后，就把我调市委宣传部工作，并反馈给钱大姐。但她还是要求调北京，还说监察干

部目前懂行的不多，希望不要改行。于是省委就研究决定将我调省监委工作，江政委说只有邱大姐出面给钱大姐说说，可能还抗得住。她并告诉我，到省监委是当秘书长，总管日常工作。她要我早点去上班。

1956年9月，我告别南京市委，到省监委报到，省监委书记是辛少波，林浩然、康迪任副书记。加上李执中、徐进、李钟英、张加洛等组成常委会。省监委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和执行党纪。全省县级以上党员干部要受党纪处分的，全省党员干部要受开除党籍处分的，都要报经省监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或批准。省监委机关设农村、城市、省直三个检查处，还有一个审理处，我任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又兼机关支部书记，综合管理日常工作。常委会一般每周一次，凡下面报来的案件，或者三个检查处检查的案件，都先交由审理处审理后，由办公室综合安排，分别提交常委会讨论，也有退下去增补材料或征求改变意见的。常委会议定后，就由我审核全部材料：包括本人检查交待，由处理单位综合的调查报告，有关方面旁证材料，处理决定稿，各级审理意见，同本人见面后的陈述意见等六项齐全，还要做文字上的修饰，然后由我签发。

我和辛少波的秘书共处一个办公室，所有的机要文电都送到我们这里，所以内部消息知道得多一些，也知道得早一些，而相对减少了和外界的联系。1957年“反右”前，外面大鸣大放，而我们这里相对平静，主要从内部简报和报纸上知道一些情况。省直机关党委也曾通过支部动员大家参加鸣放，并去其他单位参观大字报。记得楼上省委宣传部非常热闹，但我们机关仍然不温不火。我曾和辛的秘书开玩笑说，外面刮十二级台风，而我们这里是处于台风眼，相对平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等重要文章都是从文电中先看到的。彭真来江苏在西康路33号动员，我虽未参加，但其主要精神也略知一二。所以当“反右”来临时，并不觉得意外。只是后来出现的一些右派言论，在我看来似乎也有道理，有的只是说得偏激一些；对号召“交心”“引蛇出洞”之说，认为似乎有失诚信。后来又出现了以世界观划分阶级的论述，也使我困惑，难道马克思关于以经济基础划分阶级的学说已经过时了？但所有这些想法，均未表露过，只是“腹诽”而已。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敲矿石，抬煤炭，我和大家一起劳动，夜以继日，热情很高。但后来看到拆铁门铁窗作为原料，而炼出的钢像豆渣一样，又一

次产生了疑虑。

1958年10月初，参加省委检查团去宜兴农村搞“整风整社”，带了十几个人分管周铁桥一片，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了解到江南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在我们到宜兴之前，省委第一批检查团才走半个月，听群众讲，这批人来时夹道欢迎，走时鼓乐相送，好不威风。那时正值秋收，好多大队亩产放“卫星”，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有两个老太吃过饭走下水桥（江南的河边石梯）洗碗，弯不下腰，直着喘气，一弯腰，就把才吃的饭吐在河里了。有两个贫雇农出身的老农，见到散落在桌上地下的饭块，大呼作孽，把它收拾起来，连同大锅里的锅巴放在窗台上晒干储存起来，说总有一天要没有饭吃的。我们去的时候，大食堂依然还开着，但已经按每家人口数限量打饭。我们是交粮票的，而且吃得也不多，所以还能保证供应。但过了几天，也出现了问题，供应我们吃的是新挖的百合（周铁桥渎上盛产百合，为宜兴土特产），但不见各户来打饭。到大灶上一看，大锅中都是山芋秧子和南瓜叶子，撒上少许元麦粉为粥，各户用容器来打，另有一些幼童也发给一些百合。小孩边啃百合边哭，喊“饿啊！”“百合苦，要糖！”听了真不是滋味。宜兴乃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到农村耳闻目睹，而只是坐在办公室学习，那歌颂“三面红旗”之声是没完没了的。

年底回到南京。不久，陶白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找我，说华东艺专要改为南京艺术学院，想调我去当党委书记，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表示同意。因为我自幼爱好文学艺术，当初奉命从上海打进南京时，我就想报考中大艺术专修科，后来托人报名的那位自作主张，替我报了农业专修科，当时我想只要能来南京即可，也就同意了，可以说我之学农乃是历史的误会。而现在要我出长艺院，当然高兴。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自忖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留在组织监察部门工作，终非长策。当我家出事时，我就主动要求调往文教单位工作，但组织上劝慰未动。现在这样安排，等于实现了我以前的请求了。随后辛少波同志正式找我谈了调动工作之事。1959年2月底，我到华东艺专即后来的南京艺术学院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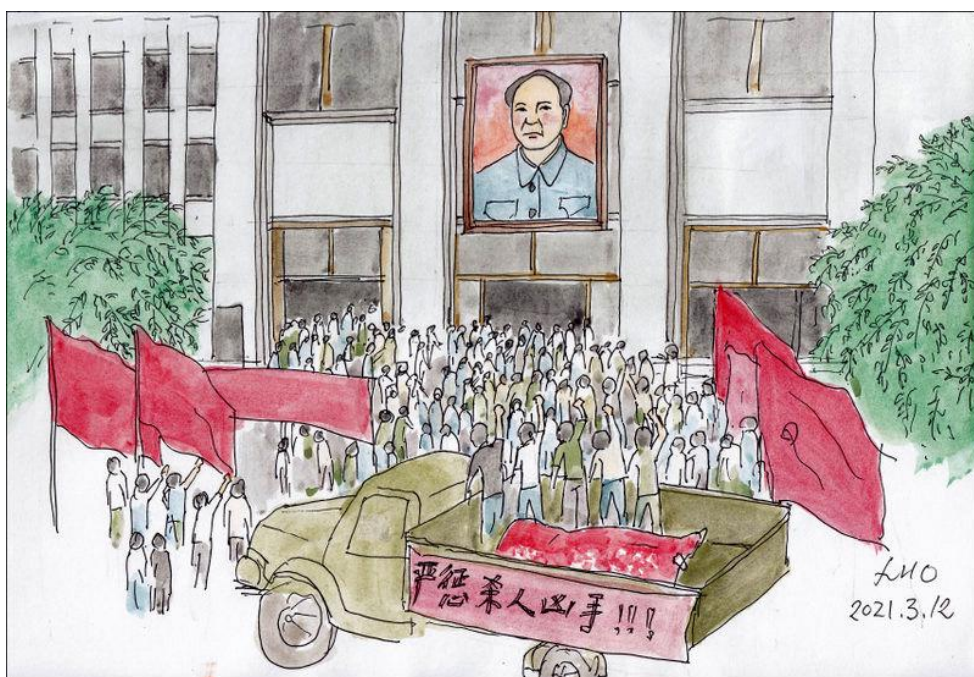
【百年中国】

画说我的一生

刘海鸥

15. 动摇的钢铁长城（上）

（1966年5月——1966年7月）



回到北京，硬着头皮回学校看看。学校已经“复课闹革命”，但也没有上文化课，老师学生都在学习中央文件，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中的“控诉”并不成功，学生中派别多，控诉会上或对立赌气，或起哄捣乱，或害怕沉默。老师们也要到班级和学生一起控诉，学生们对我还不错，好像半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我再也产生不出对学生的任何热情，勉强跟他们应酬。老师们也在“控诉”，曾经被整的人把控诉的矛头指向整人的人，互相指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新一轮的内斗。没人搞得清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控诉”出什么东西？

我远远地观望着，心里充满不安：难道在这场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一个中国青年仅仅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吗？

在北京呆了不到一个多月，外面的形势千变万化。“造反派”和“保皇派”

的斗争越演越烈，为控制局面全国各省份实行军管。而军队又卷入派性，致使两派斗争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到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北京也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规模的武斗。一天我在北京市委门前，见某大学生开车拉来一具尸体，上覆盖一面红旗，正值盛夏，上面零零星星地撒了一些小石子大小的冰块。学生们要求市委解决武斗问题，严惩杀人凶手，但市委早已瘫痪，根本没人过问。

北京的武斗是局部的，而全国各地则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死伤不计其数。

许多北京学生立即奔赴武斗地区。克阳有一个在一〇一中的同学和她的男朋友及一帮学生到南昌支持“造反派”，参加武斗，抢夺枪支，结果男朋友被枪弹打死。听到这些消息，我又开始坐立不安，我太想经历这样的场面了。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激情和新奇感。我决定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就去哪儿。我还有一个远期计划，参加完武斗，直接奔赴越南战场。



1967年5月初，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八二六”和拥护当权派的“产业军”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传到北京的消息说，十多万人参与武斗，死伤千余，还打死了北京去的红卫兵。现在成都落入“保皇派”的手中。北京各校红卫兵听到

消息纷纷派人去四川支持造反派。

我决定到刚刚发生大血战的成都去。我是一个散兵游勇，不在任何组织，但这挡不住奔赴“前线”的勇气。

还是老办法搞的票，同行的还有邮电学院的几个男女同学。

在成都我们住进了四川大学。天正在下雨，成都的五月总是那种靡靡细雨的天气。我没有雨具，买了一个直径二尺的大斗笠，高挽裤脚，穿着一双草鞋，在川大校园里穿行。我特别喜欢这身打扮，自己感觉如同女红军一般，透着一股飒爽英姿。我喜欢穿草鞋，一毛钱一双，晴旱都不怕，连脚气都好了很多。



我们住在教室里，床是由课桌拼起来的。我发现同屋有一个师院附中高二的的女学生马晓力，她是前劳动部长马文瑞的女儿，也是独行。这些干部子弟文革初起时个个都不可一世，后来父母都被揪出，便才知道落寞和悲观，也稍微平民化了一些。在水池洗脚时与她照面，她竟主动与我说了几句话，让我心里对这些人又升起一些同情感，她毕竟不像其他红卫兵那么狂傲野蛮和偏激。

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提及，但多少年后知道了马晓力的为人，她不仅不像多数高级红二代那样骄横跋扈，而且曾在师院附中百年校庆中向受迫害的

老师道歉和默哀；曾举报和要求制止在人大大会堂演出带有文革之风的红歌会；曾给党中央总书记写公开信要求公布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人大代表的财产状况；曾反对当局在内蒙小学强制推行汉语教学……是一个有头脑有良知的人。联想当年，她对我的温和态度，与今天她的作为是一脉相承的，故以画表示敬重。



成都的几场大规模武斗已经过去。中央文革在5月7日发出解决四川问题的声明，支持造反派“八二六”。“产业军”垮台了，从成都撤到农村，等待包围城市的那一天。

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武斗的迹象。午饭时，街上都是吃饭的女工，花衬衫，戴袖套，身围着一个饭单（围裙），手拿一把巨大扁圆带把的搪瓷缸子，里面盛着饭菜，三五成群坐在商店或作坊门口，边吃边聊，似乎政治、斗争都与他们无关。只有满街的高音大喇叭里不断地播放着“八二六”的派歌：“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曲调借助一个藏族民歌，调子很好听，听久了，也会唱了，经常不自觉地跟着喇叭唱，可是一唱到“八二六战士”就又咽回去了，谁知道“八二六”是个什么玩意儿。

像在任何城市一样，再心怀革命，也忘不了吃。我在成都吃了赖汤圆、龙抄手还有地地道道的夫妻肺片。



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武斗的迹象，成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余地了，我们呆了几天继续往西南行走，经贵州去昆明。

同行的邮电学院学生中有一个叫陈野的男孩子，与我同岁。身材十分瘦小，几乎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来自贵州某县的贫农家庭，原名就是一个农村中最常见最普通的名字，文革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野，以示他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狂放的生活方式。这已经使我心里暗暗佩服，想想，在火热朝天的革命时代，人人都改名为卫东、卫红、卫革时，他却改名为“野”，这需要有多么特立独行的性格。

陈野分析形势头头是道，既有思想和见地，感觉也很灵敏。他不偏激，更无当时工农兵干子弟的优越感。他和我们同行与革命的关系不大，只是想了解社会民情。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主要是听他讲。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火车停站之处尽是要饭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很烦，说要是换了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向人家屈膝乞讨。陈野的反应很激烈，没想到他是如此的愤怒。他谴责我道：“你知道什么叫饿吗？你们城市人养尊处优，过着阔小姐一样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挨过饿。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的滋味，才说出这样的风凉话来。当一个人饿的忍耐力达到了他的生理极限，求生

的欲望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你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也不懂得什么是同情心。我经受过饥饿，如果我饿极了，没有任何出路，我是会去要饭的。而你们到了那时候也不会保住你所谓的尊严的。”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惭愧，我对这个农民的儿子越发地敬重起来。



5月中旬，我们到达了昆明。一下火车，就沿路看大字报，昆明的两大派组织是“炮团”和“八二三”。我们一行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温和派“炮团”的立场上。“八二三”是造反派，由于有昆明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他们控制着昆明以至整个云南的局面。街上高音大喇叭播放着他们的“派歌”：“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不再唱这支歌，总觉得充满了挑衅意味。还不停播放一首骂“炮团”的歌：“四二六大杂烩，老保玩火来示威，革命造反派造了他的反……”结尾连呼“造得好来造得对”，滑稽的是，云贵川语系的“造”发音“操”（第四声），于是满街都是“操得好来操得对”呼喊，我们这些北方人听来实在不雅。“炮团”则是较温和且有理有节的，他们也有“派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也不喜欢这支歌，觉得其中有些失败主义情绪，不提气。

我们借着邮电学院的关系，在昆明市邮电总局招待所安顿下来，然后即和首都红卫兵三司驻云南联络站挂钩，他们也都是支持“炮团”的。



在昆明我们认识了许多当地的中学生，他们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忠实地为我们跑腿送信，提供一切方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叫杨崇寿，非常热心，他是军卫校的子弟，母亲是军人服务社的工人。小杨跟我们鞍前马后地跑，每天一早就到我们的驻地，跟我们去收集材料，为我们提供情报、带路、买东西、借自行车。我去过他家几次，受到了他和母亲的热情招待。

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她叫吴家惠，是化工学校的学生。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圆脸，整齐浓密的眉毛，眼睛细长，眼神温柔。最有特点的是鼻子和嘴，鼻子高而挺直，鼻尖稍稍勾进去划出一道优美的线条。嘴小而丰满，轮廓分明，红红润润的如一朵鲜花。从侧面看去，她的脸部轮廓的线条匀称而且完美。她的性格娴静，踏踏实实地做事，一点也不张扬，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钦慕之至，言听计从，和小杨一样尽其所能帮助我们。



我们的工作收集和整理两派的活动和动向，向三司联络站汇报，据说三司“通天”，任何情报直接上达最高机构。为了保密，他们还编了一些暗语，比如中央文革是“父亲”，“炮团”派是“梅”，“八二三”派是“媳妇”，“八二三”所保的省委领导李成芳（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是“孙子”。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是“四弟”。这样一份往上递送的情报就写成：“昨日在省体育馆传达父亲的四弟时，媳妇在孙子的操纵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梅死伤三十五人，媳妇死伤情况不明。”

有一天夜晚，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是和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之死有关系的。阎红彦死于一九六七年初，他的死因始终是个谜，公开的结论是“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但是“炮团”一直怀疑阎之死并非自杀，那次的情报是“炮团”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需要立即送交中央。

三司联络站驻昆机构设在云南大学内，而中央文革信使第二天一早就要回京汇报。已是夜间十二点多钟，大家还都在忙，我自告奋勇送情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是跟当地“炮”派借的。卸下自行车把手的塑料套，把“情报”卷成小卷塞到里面，再把塑料套装回去。穿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和树影摇曳的校园，我没有任何畏惧，心里充满着神圣的使命感，觉得这和战争年代何其相似。找到了三司

总部，那里仍然灯火通明，他们对一个女孩子连夜送情报很感动，热情握手，答应马上递交中央。



昆明是“抗美援朝”的前沿，各种军事机构军事院校都在这里。受到地方上文革的影响，军队也裹挟进了混战。云南的武斗当时还没发展成大规模的内战，但是已见端倪。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经过步兵学校时，见一伙被“八二三”派关押的“炮”派学员正在集体翻墙逃跑，我站在街头观看，不知里边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惊心动魄。



五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解放军卫生学校的“炮”派情报，卫校的“炮”派在礼堂开大会，被“八二三”派”包围，殴打侮辱学生。不给他们饭吃水喝已经有两天了，有些女生已经晕倒。连上厕所都不让去，他们只好在礼堂中，男生女生各围一圈在中间解手。

听到消息，我和邮电学院的一个女生立即赶赴现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包围正在解除，“炮”派学员已经“投降”，几百个男女学员排着队，拉开距离，双手抱头作投降状，鱼贯地走出礼堂。卫校双方学生都穿军装，占了上风的“八”派背着枪，或拿着其它武器站在一旁押解，面目凶狠地吆三喝四。投降队伍一字长蛇，无声地行进，他们的军帽被没收，领章被拆除，男生的脸上现出悲愤屈辱的表情，女生头发披散，脸上淌着泪。第一次看到“自己人”——解放军——“投降”，我和同去的女生都哭了。我们帮不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观察，写材料，上报中央。多年以后知道这就是昆明有名的“五二八、五二九军医校冲礼堂事件”。



“五二九事件”之后炮派在军区门口举行了万人大静坐，要求释放被抓学员，惩办八派凶手。静坐达七天之久，直到军区政委出来承诺成立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才结束。

我天天去静坐现场观察，对解放军内部打仗感到很不安，我们早已经接受了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这样的概念，如今钢铁长城也在分裂瓦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不清形势，但是觉得动荡在愈演愈烈。



我朝思暮想的是有一件军装，但是丝毫不是因为羡慕高干子弟，那时几乎每个青少年都穿一身假军装。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一片草绿色海洋。穿“军装”是时尚，我一个女孩也不能免俗。我跟小杨说起过自己的愿望，他毫不迟疑地答应给我搞一件。他说，容易办到，因为武斗有一派离开军卫校，各个宿舍都有遗留的军服。几天后，他真给我拿来一件旧军装，洗得都发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式，我高兴极了，马上穿着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评论】

试谈贾宝玉中举

刘瑜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出现的，他对封建科举制度十分鄙视。然而，在全书接近尾声，写到宁荣两府家破人亡，贾宝玉疯癫不可医治的境地时，却转笔写他中举，名次第七，以至皇上召见，又免其家人之罪，复

其官，退其物，顿时贾家大有复兴之势。

这一点许多人认为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喜剧性结局，或者至少是对悲剧的安慰，甚至于认为续作者高鹗与原作曹雪芹意志相悖，以至铸成大错。

不过，我觉得不管后四十回是否高鹗所续，总的来说是很成功的，这里仅就贾宝玉中举试说明之。

写贾宝玉中举，如果说是由于高鹗庸俗的封建功利主义所至，那么应该写宝玉终于改邪归正，刻苦攻读，考中受官。然而作者笔下是如何写的呢？

贾政欲要扶贾母灵柩回南安，葬前嘱托贾琏，今年是大比的年头，务必叫宝玉同着侄儿考去。但是虽然时常王夫人、宝钗劝他念书，他便假作攻书。一心想着那个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关。直到贾政书信催促宝玉、兰儿场期已近，务须实心用功不可怠惰。宝钗规劝：“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他才开始用起功来。

看宝玉开始用功，袭人对宝钗说：“可惜迟了一点儿，临场太近了。”

从以上的描述，足见宝玉是临阵磨枪。由于是临阵磨枪，已把科举考试大大贬低，进而又写宝玉料定中举。

在宝钗规劝宝玉时，宝玉说：“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又在临去考场之前对王夫人说：“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他还对李纨说：“嫂子放心！我们爷儿两个都是必中的。”宝玉又对宝钗说：“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罢！”

对于人们如此重视，视科举为试金，不惜以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中举，在宝玉眼里乃易如反掌。想中，就给你中个来，而且还得了好名次。如果写宝玉终身不应考，或者考而不中，那才是败笔。写宝玉中举后离家出走，是绝妙的一笔。更显宝玉心智之高，使全书的悲剧达到了高潮。全书就此结束，耐人寻味。

首先考完即出走，这是对必中的百分之百把握的肯定。在此基础上也证明了宝玉应试的目的不在于功利。因为中举后出家，这在考前就是他的既定方针。

其次，请看得知宝玉失踪后贾府的情景。

贾兰也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便愣了半天，也不

言语，直挺挺地躺倒床上。亏得彩云等在后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转来，哭着。见宝钗也是白瞪两眼，袭人等已哭得泪人一般。

可怜荣府的人个个死多活少，空备了接场的酒饭。

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命在垂危。后面又不只一处写王夫人大哭，袭人栽倒气厥。就连一向得宠的宝钗也尝到了悲苦的滋味，暗中垂泪，自叹命苦。

贾政在从南方回家的路上遇宝玉显灵的情景：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当贾政问可是宝玉时，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人不见，留下的歌是：“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这里写的大有上天与人世隔绝断音之意，这分明是生离死别。

当贾兰读信念到贾政亲见宝玉这一段时，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宝钗哭得人事不知。再听王夫人的话“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

可见宝玉出走对这个大家庭的打击之重。王夫人唯一的娇子不在了，新媳妇成了寡妇，未来的孙子成了无爹的儿。

至于因宝玉、贾兰中举而有贾赦、贾珍的获释、袭职、家产偿还、家业复兴之笔，这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更有甚者。无恶不作的贾赦、贾珍竟因为侄儿、侄孙的中举而能安富尊荣，这正是对一人生祸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制度的披露与讽刺。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对做官与当佛爷下了正确断语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书中封建正统观念的代表，一生循规蹈矩的贾政之口。他对众人说：“与其作了官，倘或命运不好犯了事，坏家破产，那时倒不好了。宁可咱家出一位佛爷，倒是老太太的积德。”何曾听到过他说如此思想解放的话。他在第一百二十回里才悟出这个道理来，这是否预示着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松动了呢？

范进几十年攻读而中之后疯癫，宝玉轻而易举得中之后出家，这是从两个侧面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

【评论】

人生难得糊涂

何与怀

郑板桥“难得糊涂”一语，多少年来，众口相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每每作为处世的警言，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座右铭。按民间传说，这四个字有几种不同的典故。

一说某年，郑板桥到莱洲云峰山观摩郑公碑，夜晚借宿在山下一老儒家中，交谈十分融洽。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以便请人刻于家中一块特大的砚台的背面。这老人自称糊涂老人，于是郑板桥依“糊涂”为引，题写了“难得糊涂”四字。又因为感觉遇到了一位情操高洁雅士，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又提笔补写了一小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

另一说法是，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七品知县时，正遇百年未见的旱灾，百姓家破人亡，因而忧心似焚，不免心力不支。其妻相劝：既然皇上不问，钦差不理，你就装作糊涂好了。郑板桥闻之怒道：装糊涂，我装不来。你可知道，聪明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他所说的这句话，后来就成了“难得糊涂”的自注。这是郑板桥对于现实的抗议之声。他的为官品格也可见于其《衙斋听竹》图中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不过，也有说成是郑板桥自我解嘲。也是他在潍县任知县时，一日正值衙斋无事，四壁空空，周围寂寂，仿佛方外，心中不觉怅然。他想，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难道就是如此？争名夺利，争胜好强，到头来又如何呢？看来还是糊涂一些好，万事都作糊涂观，无所谓失，无所谓得，心灵也就安宁了。于是，他挥毫写下“难得糊涂”。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郑板桥堂弟为了祖传房屋的一段墙基与邻居诉讼，要他动用潍县知县的地位，函告兴化县县令求情，以便赢得官司。郑板桥看完信后，立即回书一诗：“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又写下“难得糊涂”“吃亏是福”两幅字，并在“难得糊涂”下加注前述的那几句话，在“吃亏是福”下则加注：“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

损于己则盈于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心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这是心安理平说。此处“难得糊涂”指难得装一次糊涂，心安理得，也可取得心态平衡。这种“心理调节”乃是试图把自己的心理反差平衡一下，以求得方寸的短暂安宁。

各个典故不同，不管是明显的假托或似乎有事实根据，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出于后人对“难得糊涂”的不同解读，并藉此阐明作人道理，也是很有意义的。

糊涂的反面是聪明。然而，耍小聪明却适得其反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在各种书籍中也有许多事例。聪明太过，又心术不正，对人对己招来祸难，造成人生的大糊涂，大失败，《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可谓给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的反面教训。

《红楼梦》第五回，题为“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有红楼梦十二曲分咏金陵十二钗，暗寓各人的身世结局和对她们的评论。其中《聪明累》一曲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愁愁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这首《聪明累》曲吟咏的是王熙凤。此人在书中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三回，一出场就不得了。通过林黛玉所见所闻，一个雍容华贵又气度非凡的女当家立现读者眼前。随后，曹雪芹又用贾母之口说明她的性格：“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然而，这个凤辣子虽以聪明漂亮精明能干闻名，亦以阴险狠毒手辣而著称。她在荣国府几年掌权打理中，制造了许多罪恶。死在她手里的就有好几条人命：她弄权铁槛寺，贪利拆散张金哥和守备公子姻缘，致使二人先后自尽；她使人告状并加害尤二姐，又召庸医将尤二姐已经成型的男婴打下来，最终致使尤二姐吞生金自尽。王熙凤的判词称她“一从二令三人木”，指的是其夫贾琏一开始对她敬从，后来对她指使命令，最后把她休掉的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红楼梦》后续第一百一十四回描写了王熙凤因病而亡，也另有版本说她被休后又遭旧案追诉入狱，最后死于狱中。

至于貌似糊涂，其实是大智慧，在现实生活或书籍中，也有许多例子。例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摆“空城计”那个著名的情节。

书中描写，当时司马懿亲自率领十几万大军，来追击诸葛亮仅剩的一点残军，准备一举歼灭。但是司马懿到了西城时，看到的不是严阵以待的守兵，而是城门

大开，只有几个老兵在扫地。在城楼上，诸葛亮优雅弹琴，琴声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没有丝毫慌乱之音。于是司马懿怀疑有诈，传令退兵，此回合便以诸葛亮的胜利而结束。

“空城计”是诸葛亮成功的代表作。那么，真的是司马懿太过谨慎而中了诸葛亮的计谋吗？有论者并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亦深以为然——所谓“中计”一说完全站不住脚。西城不过弹丸之地，就算有埋伏，但双方实力悬殊太大，也很难改变战局。并且，司马懿完全可以先派人前去探个虚实，然后再决定是否派大部人马进攻。因此，可有一问：为什么司马懿不动一兵一卒，扭头就走？身经百战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大将军难道会如此糊涂吗？

如此往深一想，就不禁拍案叫绝：他司马懿太了不起了，其谋略太深远周密了。熟读《三国》者都知道，曹氏宗族对司马懿相当提防，基本都是半利用半防范。一开始曹操对司马懿就是又爱又怕，爱因其才，怕是因其篡位，因此平时一直没有让司马懿掌管兵权。曹氏宗族多年来对自己的态度，司马懿哪能不一清二楚呢？所以他心中确信，诸葛亮是他存在的价值，两人相辅相成，互相牵制，如果诸葛亮被抓了或者死了，自己也离死期不远了。“空城计”一役，司马懿考虑的早已不是军事问题了，而是政治大局，也是自己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因为他司马懿有此深谋远虑，最终熬死曹氏宗族而成功上位，成了三国最后的大赢家！

诸葛亮当然更是值得称颂的。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辛辛苦苦建立的北伐防线全部瓦解，甚至都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在这样危如累卵的情况下，诸葛亮还敢使用空城计，摆出了和司马懿誓死同归的架势，并非因为猜到司马懿足够的谨慎，而是认定他足够的聪明，算准他肯定首先会考虑保全自己。毕竟两个人斗了那么多年，双方思路行事各都心知肚明。当然，诸葛亮也知道，万一司马懿选择攻城，自己绝对被活捉，绝对成了天下第一糊涂的笑柄。因此也应该说，他的“空城计”不单是基于神机妙算的大智慧，也是出于为了国家不惜冒粉身碎骨风险的崇高精神。在这一点上，他比司马懿高尚。

以上说了这许多，我的意思是，与其附庸或竟然真心崇尚“难得糊涂”，不如清楚表明并试图践行：“人生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不。人生难得糊涂！现在，许多人都有此共识：这是充分感悟人生的一种境界——不糊涂者是因为心中有大目标，着眼大方向，具有全局观念，

自然对枝节杂碎不屑一顾。这是一种非凡的智慧——在纷繁变幻的世道中，既能看透事物，分清大是大非；又能看破人性，处事分清轻重缓急，举重若轻，大智若愚。这是美好的品格和气度——这种人超凡脱俗，底蕴深厚，胸襟坦荡，包容万象。他们不会糊涂到争名夺利，而是以平常平静之心对待人生，泰然安详，宁静致远。这也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大凡人生一世，必须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即使经历风霜坎坷，也不能糊涂沉沦。

如今人们大多长寿，但别把自己活成闰土才好，更不要像王熙凤那样“机关算尽”。而司马懿、诸葛亮这种大智大勇者，在人生路上足可参考借鉴。❶

【读书】

浮生羁旅渡残舟

——《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读后

启之

文伯先生1951年出生，跟我同岁。他出身地主，我出身职员。毛时代他吃农业粮，我吃商品粮。我当工人时，他成了盲流黑户。后毛时代我有退休金，他没有社保。按照“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分层”，我排在第四，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排在第十，属于“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者阶层”。

造成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出身的不同。他是“黑五类”，属于中国大陆划定的人数最多的政治贱民。这一“中国的犹太人”群体是土改划成分的产物。毛时代成分与出身同等待遇而且世袭，文伯的父亲是地主之子，他是地主之孙，但是他与父亲都背着地主的黑锅。²

1979年1月11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

²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各地城乡在划分“黑五类子女”范围时，普遍流行“查三代”（即祖辈、父辈、本人）现象，以致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1965年，共青团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在青海西宁，许多中、小学都把学生家长的家庭出身作为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不少学生的家长本来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教师、职员，学生是由这些家长直接抚养长大的，但学生的家庭出身却被填成地主、富农、资本家。”“既然如此荒谬，为什么还要实行“查三代”？为什么还要按祖父而非父亲成分来填写本人家庭出身呢？答案很简单，如果不按土改时祖父的家庭成分填写本人出身，阶级斗争将很快失去对象。”见《记忆》第110期。

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他们在今后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³

据官媒 1979 年的统计，土改时的地富有二千多万，加上子女有六千多万。⁴ 在这个文件下达时，全国剩下的地富只有 440 多万人，加上子女共计 2000 多万⁵。也就是说，在这三十年中，有 70%，即一千五百六十多万地富死亡。加上子女，死亡人数达四千多万。这些人里有多少“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死于专政的枪口、暴民的打杀、政府的牢狱、三年的饥馑和文革的浩劫？我们不得而知。

官史说：给地富摘帽，恢复地富及其子女的公民权，“调整被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扭曲的社会关系”“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这意味着至少有 2000 万人将结束 30 年来备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开始政治上的新生。”⁶

二

2000 万在中国是什么概念？

1979 年中国的总人口是 9 亿 7 千 5 百万，也就是说，平均在每 50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过着“倍受歧视的”的、没有公民权的生活。

绝大部分地富子女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初，30 年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剥夺了教育权、就业权、恋爱权、婚姻权以及前途的选择权，意味着他们上不能尽孝，愧对父母高堂；下不能爱幼，愧对后代子孙。意味着他们的前半生只能在苦难和屈辱中度过。

近年来，学者们否定土改的文章不少，讲述地富及其子女受迫害的文字也时

³ 《北京日报 1979 年 1 月 29 日（第一版）。

⁴ 宣哲：《怎么看给地富分子摘帽，给资本家发还定息》，《中国青年报》1979 年 9 月 8 日。

⁵ 见 1984 年 11 月 1 日新华社报道，又见 1984 年 11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

⁶ 王洪模：《改革开放的历程》第 156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原注：据《半月谈》1988 年第二期。

有所见，地富子女自述家庭变故，父母含冤，本人受歧视的文章也曾零星见于报端网上。但是，完整地讲述一个地富子女一生遭际的文字，我还没见过。

三

韦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他出生于广西柳江县三都乡（现为土博镇四案村）屯马屯，世代为自耕农。解放前夕，地价暴跌，他的祖父倾尽家中积蓄购进二十余亩田地，旋即被划为地主。土地、房屋、财产被悉数抄没，一家十口被扫地出门，搬到屯后山腰间一处茅屋中居住。其后，为谋生计，举家迁往三都圩赁房而居，依靠父亲行医，母亲挣工分维系生活。他的两个姐姐因家贫早嫁，两个哥哥成绩优异，却因出身而无法升学。哥哥们千里迢迢跑到新疆，谋求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皆因出身被拒。队里为了增加收入，派青壮社员外出挖矿，因为哥哥在其中，县里勒令所有的外出社员回来种地。这十七年中，从他出生到小学毕业，最好的衣服是妈妈做的一件纱背心，只有到大姐家才能吃上一顿饱饭。同学的欺辱，干部的歧视，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为了表明立场，他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在作文中刻意抹黑自己的父亲。为了争取进步，他踊跃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在三都中学的文艺演出中，与同学一道演出了揭露美国种族歧视的小品。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至1979年。1966年，正值他初中毕业的一年，文革爆发，被留校参加运动。到各地串联后，他回到家乡，参加了造反组织“广西4·22”。这一组织一度被中央视为“革命造反派”，但在毛泽东批示的“七三布告”中，这一有着数十万之众的“422”，一夜之间沦为反革命组织。“广西王”韦国清调集军队，利用对立派对“422”实行血腥镇压。⁷文伯的家被抄，全家被迫逃亡，二哥致残，三哥被打死。他本人被关押、毒打、批斗，右臂一度残废。为了免遭迫害，1971年他不得不放弃户口，沦为“黑人”，在贵州、福建、温州等地流亡。

流亡期间，他结识了众多的社会底层的朋友，干起了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的勾当。他们倒卖粮票、贩卖片糖、宝塔糖、红参、猎枪火药、日产手表甚至猪肉和糖泡酒。“非洲村”（因倒流城市而失去了户口的“黑人黑户”的聚居地）

⁷ 关于广西“422”的人数，据韦先生说，准确的人数不知道，只知道“七三”布告前后，官方记载的被屠杀的有名有姓的达89700多人，无名无姓的30000多人，失踪的，下落不明的30000多人。据韦国清当年与最高法院副院长说的死15万多人。柳江县持反韦观点的人不少，但参加“422”组织的也就二三百人。

成了他的匿身之地。⁸火车站、鸡毛小店、黑市窝点是他的出没之所。凭着机智勇敢，靠着江湖朋友，他赚过钱，但查抄、黑吃黑、拘捕、挨打、收容（他曾六进收容所）成了家常便饭。这期间，有多位年轻美丽的女性向他示爱，但他的出身和“黑人”身份，使他一次又一次自动远离了心仪之人。

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乘着地富摘帽的东风，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告别了“黑人”身份，落户于广西河池市金城江镇，在蔬菜生产队当上了菜农。28岁那年，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不甘平庸，自己创业，搞过面条加工，建过砖厂，卖过凉粉、包子，开过汽车修理厂，做过猪牛皮生意，开过小卖部，还在一些公司里当过业务主任、副经理，还得过政府颁发的中级“经济师”的职称。

在各种“潜规则”之中，他奋斗经年，赚过一些钱，2000年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柳州市买了房子，由农民变成市民。他在路边摆了十年烧烤摊，终于因市容整顿而黯然收场。2012年他彻底失业，他用不多的钱为妻子买了社保，如今夫妇俩靠妻子每月两千两百余元的养老金度日。作为城市化的受益者，他的三个孩子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教育，过上了勉强温饱的生活。

经济生活的拮据，没有影响他对文学的爱好。他的诗词作品在当地荣获一等奖、三等奖、优秀奖。他创作的百余篇小说、散文、杂记、诗歌，时有见诸报端网络。

四

韦先生从1997年开始写作此书，时断时续。2013年他完成了此书的前半部《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他当年的老师，孙国光先生为之写了序。我是通过这篇序言知道他的⁹，后来又在《记忆》上陆续看到了此书的节选，¹⁰听到读者的好评，我希望他继续写下去。韦先生不负众望，终于在2021年9月完成了此书

⁸ 韦先生对“非洲村”有如下的描写：“在当时中国的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广西的柳州、南宁、桂林的“非洲村”也都基本一样，只是各地“非洲村”的棚屋有些大同小异，所用的材料各有不同而已。柳州人善于砌筑，就自制些泥砖或者捡些随处可见的石块，或者烧过板结的煤碴饼，用些烂泥浆砌筑起来，与贵阳的“非洲村”相比，柳州这些棚屋较正规工整些。”这些群体里“不乏曾经是某些部门的书记、主任等党政领导级人物；也有的曾经是控管一方治安的公安局、科、所等带长字号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红极一时的星字号艺术家；更为常见的一部分人，则曾经是为人师表的老师等等。”

⁹ 孙先生的序言写于2013年，题目是《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序——读文伯回忆录有感。见《记忆》第235期。

¹⁰ 《记忆》曾分三期连载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见第237期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一）——一个“地主崽”的一生第240期文伯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二）——“四类分子”·市管会主任·贫协主席，243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三）——儿女的求学与父亲的药担。

的后半部，书名改为《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写此书，他用了24年。

韦先生能完成这本书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他上过学，虽然只读到初中，但是，他是个读书种子，从小好学，打工的时候也不忘记读书写作。他有志气，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历史，为后代留下一代人的经历和所思所感，成为他写作的动力。第二，他生长的三都圩，是个商贩云集、信息流通的小镇。这个环境使他有了较丰富的见闻，较开阔的视野，也培养了他走南闯北的胆量和农民少有的灵活头脑。第三，他的父亲是中医，母亲虽然是文盲，但也受过旧时礼仪家规的熏陶，对他幼时的成长起到良好影响。他的大哥是国家干部，二哥三哥都是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这样的家庭不但培养了他的求知欲和进取心，而且给了他实际的帮助。他能落户乡镇，全靠哥哥的努力，而这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文伯先生在古稀之年创建了两个第一：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地主崽一生的作者，这本书是第一次揭示了文革时期地下黑市的著作。❏

【序跋】

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

作者前言

文伯

少小无知家国忧，浮生羁旅渡残舟。
秦淮涕泪怜商女，燕市悲歌学楚囚。
负重呕心当馭马，躬耕沥血任驱牛。
悠悠往事云烟散，历尽沧桑风雨稠。

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伴随着共和国出生，也伴随着共和国的苦难成长。他们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屈辱，但在共和国的史籍上，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他们的遭遇一直被埋在历史的长河中。

由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出身，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他们无法享有做人的起码尊严。他们也有崇高的理想，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们当中不乏才华优异者。但命运注定了他们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们曾经迷茫，曾经绝望。改革和开放使他们获得了新生，看到了希望。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已被那曾经疯狂的岁月消磨殆尽。他们的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光已被无情地蹉跎。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含恨郁郁而终。在新时期的改革浪潮中，他们当中也不乏成功者，这恰恰证明了，当年对他们的歧视，对他们的不公，埋没了他们大部分人的才华，也毁掉了他们的人生。假若，他们都出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里，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家……也将会出自他们这个群体。



近年来，追忆“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苦难经历，在报纸上、书刊里，在电影或电视剧中时有所见。但是反映农村“地富”子女的冤屈和不幸的作品却极为鲜见。虽然在一些电影、电视的情节中也穿插有这类人物的不幸身影，但却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对造成他们这个群体不幸的根源——阶级斗争及其“血统论”的政策，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和所有相同命运和遭遇的人们一样，我对此体验至深，心中有着难以忘却的痛楚。

人们习惯于给“伟人”“名人”树碑立传。或者自己书写《回忆录》，书写《自传》，来回味自己曾经的辉煌。然而，作为阶级斗争年代中的“政治贱民”，我与生俱来的只有苦难。在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伴随着共和国起死回生的变革，我也获得了新生、看到了希望。在我并未志得意满的年届古稀时蓦然回首，自己前三十年的青春已悄然远去，这三十年以后的人生却还在延续。而在这三十年后的人生道路上，也并不都是灿烂的阳光。在命运的起跑线上，由于先天的不足，尽管我经过苦苦挣扎，最后只能为蹉跎了的年华而感叹。为此，我想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人生如实地记录下来。《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就是我一生所经历过的，至今难以忘却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一缕追寻历史的踪迹，这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后 记

一

行文至此，总算完成了我这一部回忆录的写作，不禁让我油然生出一股告别的感慨。但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要告别什么？告别青春？我的青春早已远去。告别我一生的事业？我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业，我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都失败了。连我最后赖以生存的一个夜市烧烤的路边摊生意，也因失去了摆摊的地方而黯然收摊停业，在市面上永远消失了。期以改变我悲惨命运的希望，都一个一个的破灭了。我告别了我一生的奋斗，停止了挣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唯一还能做的，就是把我一生所经历过的酸甜苦辣，回忆并且记录下来，以期弥补一些正史所无法企及的，一个社会底层人的民间信史。

回想我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到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岁月，我把它称之为“疯狂岁月”。这与大部分人所认同的“疯狂岁月”，在时间跨度上存在一些差异。人们通常所称的“疯狂岁月”，指的只是文革历史的十年。而我所指的则是包括从共和国的建立，到文革十七年的全部年代。因为在文革前的那些年代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年代，事实上一直都处在一种全民疯狂的精神状态之中。在那段疯狂的历史中，同样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荒谬和错误，而并不是我们所被灌输的“一贯正确”。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地得到反思，放任荒谬

成为真理，而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相信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对我的这一感受的认同。否则，其后所有的改革都将是无的放矢。

随着那疯狂岁月的逝去，我们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随之被消磨殆尽了。尤其在广西，在中共中央着手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结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好走过她35个年头的青春岁月。35年的美好年华，都让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给蹉跎和浪费了。我个人的命运，更是与共和国这35年的历史分不开。我不但受尽了饥饿与贫穷的煎熬。也由于我的出身，而遭受的非人的歧视，则是我最难以承受的磨难。它毁掉了我全部的童真乐趣。我和我的家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俯首低眉的承受着“千夫”所指，像畜牲一样屈辱的苟且偷生。在那30多年里，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而我所迫切需要的是作为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为了生存，我曾经作出过无奈的抗争——到处流浪、做野马工、做投机倒把生意……。我的青春年华都在挣扎中被消磨掉了。前30多年的苦难生涯，已经成为过去。这后30多年让我感觉到，我终于获得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让我感到满足（从苦难中挣扎过来的人都容易满足）。而当我的人生已经步入老年的时候，我却不得不继续为生活而挣扎，直到和我同龄的一代人都已退休，依法享受着退休福利的时候，我却依然还要为我的晚年生活而挣扎。

二

早在1997年冬天，一家人漂泊在珠海，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已经着手开始了这个写作计划。但那时孩子们还小，还未能自食其力，生活无法安顿下来，也就静不下心来写作。再者当时我还没有条件接触到电脑，而是用纸笔书写，效率很低。为此，我让大女儿去学电脑。之后举家从珠海回迁柳州，生活仍属漂泊不定，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不得不中途辍笔。一直到2008年，我终于自己有了电脑，并在大女儿的指导下，在电脑上摸索着拼凑出些文字来的时候，在疲于为生活而日夜操劳的间隙，我又开始把那些过去的往事，一截一截的拼凑连缀起来。由于自己粗浅的文学功底，我总在心里揣度着，我的这些文字，能否让孩子们读懂我内心的酸楚？（我写作此书原本只是为了留给我的孩子们看的，没有想过要出版）收中没有杜撰，没有隐讳。只是因为所有的经历，并不止于书中所

述。而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以及我的写作水平所限，还有许多我所经历过的故事，难以一一呈现在这有限的篇幅中。

我记录在这本书里的一桩桩往事，让人觉得书中罗列的，是太多的苦难。我也曾力图从我所有的记忆中，找到多一点美好，但我无法拼凑出，能让我自己认为可以自圆其说的，让我留恋而不能忘怀的美好故事来。在我前半生的经历中，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这些苦难，而这些苦难又都是人为造成的。我只能如实地把他们记录下来。

当我完成了《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的回忆和写作时，我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写作过程中，我犹如又再一次经历了那曾经的苦难。我击打着电脑键盘的双手颤抖着，在电脑的荧屏上，幻化成一个个滴血的文字，进而一幕幕地还原了，那些已经成为过去了的一段段往事。我为我自己，也为我们那一代人的悲惨经历而伤痛哀怜。同时也为孩子们对我们过去的经历，所表现出的无知和冷漠而感到悲哀。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人过去的经历。但是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他们不愿意了解我们的过去。而我们却在苦苦地追寻过去，为的是不想让他们再重复我们的过去。

此书在写作过程中，以我平生所学，加之一生的坎坷，没有机会得以深造，仅凭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对知识的渴求，自学到一点可以把心里话用文字来加以表述的基本技能，再加上有众多的老师、朋友，如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孙国光先生，以及得到众多同情、关心和鼓励我的，各在天涯素未谋面的师友吴迪先生、印红标先生、孙怒涛先生、黄玉梅老师的多方指导，尤其是吴迪先生的循循指教。没有这样的条件，这本书的面世将是很难想象的。谨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最最诚挚的谢意！

【述往】

农村的文革之火在燃烧

文伯

—

自1966年6月9日，柳江中学部分学生到县委贴出《炮轰县委、火烧县委》

的第一张大字报时起，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只是局限于在学校里面写写老师的大字报。我们没有涉及社会上的运动中去。

到了6月17日，县委发出《认真发动广大民兵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到了20日，县直机关由声讨“三家村”转入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随之于23日成立了中共柳江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开始向各中学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到了8月份，在县委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县直机关干部连日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县直机关五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五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由文革小组提出来的，并非学生和群众自发提出来的。县委文化革命小组是在县委领导下的。批判谁，都由文革小组作决定，学生和群众都是被运动着的。柳江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7年前的初始阶段一直都在县委掌控中。

1966年8月份，从北京开始，掀起全国性地对“牛鬼蛇神”进行抄家的活动。“牛鬼蛇神”是包括在土改运动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土改后的历次运动到反右派运动中划定的坏分子、右派分子。每经过一次运动，又增加了一批新的阶级敌人。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又提出了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等等各种名目类型的阶级敌人。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成为各种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开篇所引用的最高指示和理论依据。在公安部的怂恿下，在全国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使全国陷于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什么是错误的思想？什么是毒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运用手中独揽的大权，视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无物，为了达到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为了使“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合法化，出台了凌驾于原有法律之上的“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明确了凡是与毛主席，以及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有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就是错误思想，就是毒草，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反革命，应当打倒，应当惩办。在全国十亿人中，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别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反革

命分子。这样，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无限的程度，搞得人人自危。所谓的阶级敌人已经远远不止于地、富、反、坏、右分子了。“五类分子”已经不足以概括所有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的总称。有了公安六条，之后刘少奇的被打倒就变得合法化。有了公安六条，一切无法无天的行为就变得合法了。

从北京开始的抄家、打人之风在全国盛行的时候，“公安六条”还没有出台。但却是得到了公安部的公开支持和纵容的。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从北京开始了以批斗五类分子为名的抄家打人浪潮。以至泛滥到全国各地。

那时候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地方对五类分子的批斗和抄家，还不是什么红卫兵搞的。而都是在各级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下，有计划地统一部署之下进行的。那时候，除了毛主席一个人外，几乎没有人能知道这场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所有人都唯恐落后于形势，都争相紧跟。且都是将宁左勿右的手段运用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推波助澜地把形势推向高潮。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来得猛烈和残酷。

我们三都公社对五类分子的抄家是在公社统一布置和领导下，由各大队带领着民兵去执行的。抄家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中挖掘出被抄家的人对党对毛主席，对贫下中农不满和仇恨的证据，即所谓的“地契”和“变天账”之类以及有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文字笔记等反革命证据，能够证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证据。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教育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抄家的时候，对于那些被认为有旧思想旧文化的书、画和涉嫌封建迷信的各种器物，包括带有封建色彩的生活用品，凡是贵重的东西都在被抄之列。

听家里人说：到我们家里抄家的是本大队党支书李大姐亲自带着四个背着枪的民兵，以及两个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的一个贫下中农代表。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可以称得上封建的东西。但是二哥三哥最心爱的几本小说：《普希金诗集》《鲁迅书信集》《红岩》《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及一些杂志和二哥平时所写的诗稿、笔记等，都被抄走了。在三都街上的抄家活动中，在银匠刘庆禄家的收获最多。

民兵们抄走了他帮人加工打制的小孩的头饰，银锁、脚链等封建迷信的不少的银铜器物。同时还在他的一个账本中发现了他写的一首打油诗：“手拿金子脚踏银，每想无钱最伤心。本来就是空名义，难比一般劳动人。”被作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变天账”的证据，在抄家过后，为了这首诗，大队组织在街上开了他几个晚上的斗争会。逼他承认对共产党对毛主席不满，要对贫下中农反攻倒算。

在公社文革小组的布置下，在我们街上最先开展的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街上非农业居民的工商业联社的主任（相当于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这工商业联社的主任于是也成了“牛鬼蛇神”，也成了被抄家的对象，他家一台中华牌缝纫机也被抄到大队里去了。这种现象是当时广西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应对这场运动的普遍手段和策略。那些基层干部当然不乐意把这场运动的矛头引向他们自己。

二

抄家风潮过后，就在全县范围开始搞起了“红海洋”。

运动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让人感到捉摸不透。8月28日，柳江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而县委机关却也紧接着在9月1日成立了“赤卫队”。而“赤卫队”却规定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我们学校的“617”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立都是在文革工作组授意下成立的。这种运动状况，显然与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和目的不相符。之后不久，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悄悄地撤走了，什么时候撤走，为什么撤走，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内情。紧接着，毛主席号召的全国大串联运动开始了。毛主席号召开展的全国大串联的目的，就是通过大串联，让北京的运动模式作为样板，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到1967年的元月份，我们串联到上海时，“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语已经随处可见，并已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家乡的针对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的群众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社会上全面展开的。那些原来还在领导和布置对“牛鬼蛇神”的批斗和抄家的公社书记，大队支书们，终于也无可奈何地被列归“牛鬼蛇神”之列。被群众自发性的揪出来批斗。

柳江县委各机关这时开始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学校也陆续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纷纷揪斗各单位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即各单位的一二把手。随之各级党政机关都先后瘫痪了。三都公社也不例外，正在揪斗公社书记，批判公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大队的党支书也都分别被游斗。其阵势就像是当年土改运动一样。而批判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的反动路线的实质内容，则基本上以农村农民的切身利益展开的。最能激励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的，则是当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所造成的“大饥荒”，给农民群众受苦挨饿死人的事例。群众都把这些责任归咎于积极推行这些政策路线的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们身上。农民群众对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解就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年代的饥饿贫穷、浮肿死人，使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那些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们正是这一切的最积极的推行者。被批斗的人感到冤枉：他们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他们知道自己成了这一切的替罪羊。但他们心中也很清楚，他们虽然不是使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始作俑者。但是老百姓们毕竟是被他们一个个强迫着成为公社社员的。同时，他们心中也明白，这是群众运动，和过去的历次运动一样，谁对谁错，群众说的是不算数的，运动开始时，他们总要先受些委屈，只有到了运动结束后才能见分晓，正如反右派运动一样，最后还得由这场运动的发动者说了算，也就是最后还得听毛主席表态才算数。他们始终抱着“相信党相信领袖”的坚定信念。他们知道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主席发动的，而这“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会容忍人们反对他自己，也不会容许人民反对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被斗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这一切看起来不过是走过场、随大流，他们已经在心中盘算着秋后算账的事了。

三

农村的老百姓们随着“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的提出，看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农村生产队的队长，都被冠以“走资派”的政治罪名，任由群众批判斗争。于是各地农村的农民群众也就有了奉旨造反的勇气，纷纷起来揪斗本大队的党支书。农民们的运动热情像是土改运动时一样被挑动起来了。他们把在土改运动中学到的斗争方式方法，全盘照搬的运用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来。他们把那些受批斗的公社书记和大队的支书们，像土改运动中的地主一样，戴上猪笼帽，挂着黑牌子，用绳子反绑着手臂，有的还用锅墨灰把人脸抹黑。被斗者若是女的还被在胸前挂着破鞋，由群众押到街头、村边的戏台上

双膝跪地、低着头、弓着腰接受批判斗争，随后游街、游村示众。让群众喊口号，吐唾沫……，等等手段不一而足。总之极尽了对被批斗者的漫骂侮辱之能事。有的还要让他（她）自己提着个铜锣或铜盆、簸箕等东西，自己敲着、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

土改那时群众不了解政策，怕得罪人，所以开始时并不积极。直到工作队以分田地分浮财的利益去激励、去驱动，才激起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以领导干部作为批斗的对象，而且批判的是这些公社书记和大队的支书们所执行的，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激起了农民群众平时对于干部们的不满情绪，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汹涌澎湃。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从他们被迫加入初级社到高级社，然后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把自己的田地、种子和犁耙、耕牛，全部一下都归了公、入了社，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收去炼了钢，粮食、鸡鸭、牲畜都收去交给大饭堂，搞得大家都一贫如洗了。说人民公社食堂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随便吃饱。到头来连稀饭都没有得吃饱，反而是弄到吃野菜咽老糠的地步，结果搞得差不多人人浮肿，活活饿死了多少人。那些书记、支书们还整天逼着大家，饿着肚子去修水库做苦力。稍有不服从的，就带着民兵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的，动不动就以土改时的批判斗争威胁。这样的路线就不应当是共产党的路线。他们就活该被打倒。打倒他们或许就可以摒弃之前的那些政策，就不会再饿肚子，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这就是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运动的动机和期盼。在这动机和期盼作用下的群众运动场面，与土改运动时的场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学生们下农村来宣传，来发动群众的时候提到的农村“六十条”，是什么路线？是毛主席定的还是刘少奇定的？谁也讲不清楚。农民群众把这些争论当作是公婆吵架的“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在当时极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人们都已习惯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认定了听毛主席的话是对的。于是，别人的话就都是错的。同时，也很难听得到别人讲的不同意见。事实上，群众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刘少奇或者其他什么人所讲的不同意见。当下，毛主席讲刘少奇是错的，那自然就是刘少奇错了。就像是59年的庐山会议一样，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内容是什么，谁也没有看过，更不知道彭德怀是“为民请命”。结果毛主席讲他是“右倾

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彭德怀不就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势下被打倒了吗？群众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幕真相，就只有看眼前的事实，特别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实。而这些年以来的饥饿贫穷，是大家都切身体会到的。农民群众们在心中揣度着：就是因为这些下面的干部胡来，导致了群众受饿、死人，毛主席才发动这场运动，号召老百姓造他们的反。因此，把这些干部揪出来斗，就让群众觉得是有毛主席在撑腰，而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了。这才是当时群众自发起来的真正的群众运动。但这样的运动与毛主席的运动，目的和动机是背道而驰的。自然也就为日后干部们的反攻倒算留下了祸根。

四

李大姐并不像母亲想的那样可怜。“阶级斗争”观念在她心中已是根深蒂固，她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她把这一切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反映。她认为这是她所代表的贫下中农与地主阶级的“阶级仇恨”，她把这仇恨牢牢的铭记在心底里。凭着她阶级斗争的觉悟，那些抓她游街的，给她戴高帽的，挂破鞋的，包括所有喊口号的人，都是她的敌人。群众的运动挑战了这位一方当政者的权威，深深地得罪了这个大队党支书，她在心里认定了，她的这些遭遇都是地富五类分子在背后起的作用，自此在她心中埋下了秋后算账的种子。

李大姐是个没有儿没有女，没有老公，没有家人，独身一人的中年寡妇。听说，她老公自去当了国民党兵后，就一直杳无音讯，不知是生是死，最终下落不明。就凭她的这种身份，这种出身，在土改运动中，自然表现得积极而主动，成为土改运动中，共产党所倚重的中坚力量。她本来是个一字不识，官话都讲不利索的文盲，入了党后，也学上了文化，识得了一些官样文件上常用的字句。她更加地受到上级的赏识。在上级领导的重点培养下，把原来老实善良的老汤，从党支书的位子上挤下来，她自己就当上了这三都街周边十多个村子的党支书，从此号令一方。她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为此，她为了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形象，抛却了一切的“私心杂念”，她一个年纪本来并不算大的中年寡妇，一直就没有再嫁过人。但她并不觉得孤单，她所到之处无不前呼后拥。她始终如一的保持着一个革命干部的形象：一身黑色咔叽布女式唐装便服，在她的衣服的斜襟上，总是插着一支黑色的“金星”牌自来水笔，俨然一位涵养高深的女学者或职业革命家。

从初级社起，她就是这个大队的统治者、领导者。她深谙“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把大队的民兵组织当作她的警卫队。她每下生产队检查工作，视察生产，民兵营长、大队文书等等，一应的大队干部前呼后拥，外加几个背枪提绳的民兵随侍左右，如警卫首长一般。她更是谙熟毛主席“阶级斗争”的艺术，动辄以斗争的手段来贯彻她的领导意图。有胆敢违抗者，立即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绳之以“罚”。

1957年大兴水利，修筑工农水库，哪个村子有不上工地的人，她就让民兵一个个的用绳子捆成一串，武装押送到工地上去，也不问是地主或是贫农什么成分，但凡不听话的就是阶级敌人，就要专政。当时有个刚从村上搬来街上住的复员军人，叫韦荣瑞，刚新婚，舍不得丢下新婚的老婆，硬是不去，结果被她派了四个背着枪、拿着绳子的民兵到家里来，二话不说就从床上拉到门口街上，一脚踢向他腿弯，咔嚓一声跪在地上，然后五花大绑，把事先准备好的，写着“坏份子”的牌子往脖子上一挂，连夜就押往水库工地去。我当时才七岁多，正好在来德家门前，战战兢兢地目睹了现场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那阵子，她亲自带着人，到一些她认为不老实的人家里，把所有是铁制的东西统统拿走炼钢。把所有人家能吃的粮食一粒不留的，拿到公共食堂去，把那些能煮东西的坛坛罐罐，一个不剩的砸烂，让你只能到公共食堂里去才有饭吃。

她的这些作为，能不得罪群众？这群众能不对她怀恨在心？慑于她扯着虎皮作大旗，头上顶着共产党干部的招牌，就只能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她呢，就更是因此而得到上级的赏识，而长期占据着大队支书的位置。她曾于1964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到过北京，见过总理，铸就了她个人历史的辉煌。遗憾的是，她没有山西省昔阳县的陈永贵那样的幸运。否则，凭着她当时的紧跟程度，当个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比陈永贵逊色。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否认她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出过力作过贡献。也不能否认她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正因为她具有创造性的忠诚，以及她的那套工作方法，给群众带来过深重灾难，事实上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对她的怨愤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她则把怨恨过她的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压制。她有自知之明，仅凭她对人性的一股冷酷劲，再怎么样的蹦

哒，她也不可能越得过她的上级去。所以她也就更加倍的看重她当下这支书的宝座。她更知道，一旦她从这支书的宝座上下来了，在群众的眼中，她就不得不在群众的唾弃下什么都不是地度过了她的余生。终生保有这大队党支书的权力，是她唯一的期盼。为了她的期盼，她不择手段，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五

李大姐可能未曾想到，像江青那样身份的人，也还有倒台的日子。在江青“四人帮”被打倒的时候，她或许也已经预期到她的辉煌不会维持得多久了，但她却还必须隐藏着心中的无奈，不得不领着大队的干部、群众敲锣打鼓，情不由衷地欢呼“四人帮”的垮台。故技重演她一贯地紧跟和忠诚来掩盖她历史上的肮脏。在她的心中可能也还抱着这样的信念：她是代表着共产党的，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她李大姐就绝不会下台！她没有意识到，她的观念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历史前进的步伐，历史不会为某一个人的政治爱好和维护他的政治形象而停滞等待。她更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人帮”垮台已经过去了七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还会对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进行追究，还会清算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在处遗工作中，她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终于出现了：她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地，不得不从党支书的宝座上下来了。之后，悄无声息的，在她们当年辟为杀人刑场的，后来又建成大队企业的都鲁山脚下，孤独地终老一生，再也没有人来向她请示，来恭听她的教诲和训斥了。只有一些死难者的遗属去找过她，去当她的面控诉她的罪行，去向她讨个说法。面对死难者的遗属她无言以对。每当夜幕降临，都鲁山上吹过的风，就像那些屈死的冤魂，在向她哀号索命，使她片刻也不得安宁。不久，她也带着许多人世间的迷惑，悄悄地死去了。除了被她迫害致死的人的亲属永远记着她外，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她曾经的辉煌。那些平日里在她鞍前马后献殷勤的人，也没有谁再真心实意地到她坟上去给她上一炷香、烧一把纸了。李大姐自己也是个受害者，但她又以她手中掌握的权力，利用这场运动去发泄她个人心中的仇恨，去维护她既得的利益。她有罪，但她最后只落得个“留党察看”的象征性党内处分。她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工具而已。她是这场运动的悲剧人物，但和刘少奇比，她是幸运的。

李大姐的下场，相对于那些在她策划并默许下被“专政”而杀害的人，简直不能算是惩罚。人们在议论中不免发问：像她这类草菅人命，无视人权的人，仅

因为她是共产党的支书，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吗？像李大姐这类人在当时那个年代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我们广西，几乎在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都存在着。在我们这样的共和国里，这一类人的大量存在，并堂而皇之掌握着直接面对群众的权力，无疑是出于阶级斗争路线的需要。是在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的政治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那些基层干部们在推行这一路线的过程中，无不争先恐后、竞相效尤，并不乏采取创造性的斗争手段，对其治下的群众施以威胁、恐吓乃至血腥和暴力。再加上经济生活长期的困苦和窘迫，人民群众所受的精神桎梏和经济压迫，是何等的残酷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在这样处境下的人民群众心中所积累的怨恨的强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平时的政治高压下，是敢怒而不敢言。在最高领袖“造反有理”的鼓动下，群众不满情绪的乘势暴发，起来造反，起来控诉，起来维权，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造反，可以说是毛主席所需要的，因为毛主席原来认为这些基层干部都是刘少奇一条线上的人，是他无法插手染指的铁幕，只有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它打乱了，整怕了，才能把他们从刘少奇手中夺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没有想到，经他这样一放纵，这群众情绪宣泄的矛头，竟然却都是对着他的路线，挑战了他的权威。这是与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于是反过来利用李大姐们“秋后算账”的心理，由李大姐们来对那些离经叛道的“造反派”们，进行彻底的清算。为他收拾残局。李大姐们“秋后算账”的时候也就是他收拾残局的时机了。何等高深的政治权谋——“群众运动”的双刃剑在他手中应用自如。人民群众无法领会这政治的奥秘，他们只是看到眼前得以宣泄的机会。却没想到这是陷阱。这就是真实的被运动了的群众运动。

六

我和思学从乌鲁木齐回来后，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几个大的城市里，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群众组织都成立起来了。有学生组织，有工人组织，还有机关干部、职工组织，铁路工人组织等等。他们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把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及各地、市的主要领导拉出来批判、游斗、戴高帽、挂黑牌，放在汽车上游街示众。在会议组织者的宣传演讲的鼓动下，游斗队伍所到之处，无不万民空巷，聚集于大街两旁围观的群众，有自觉或不自觉的，都跟着那游行的队伍，愤怒的振臂高呼着口号，有些人还朝

着被游斗者吐着唾沫，扔着石头脏物，好像这被游斗者与所有的人都有着深仇大恨似的。据老人们说，过去土改时斗地主都没有这样的场面。很多人对此觉得难于理解。但在各自心中的心照不宣自己心中明了。那就是多年来思想上精神上的极度被压制，和物质生活上的极度贫困，所积聚在胸中的不可言说的义愤，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这就是人们自觉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动力。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也正是巧妙的反其道而利用了这一点“民心”，借力打力的发动了这场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我们从在外面串联时看到的小报、传单中得知：继上海1月风暴之后，广西也开始了夺权斗争，群众组织占领了《广西日报》社，自治区领导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所有高层领导，无一不成为批斗的对象，被夺了权而靠边站。广西工总组织率先发起夺权行动，其他组织也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在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县，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人们对于这样的夺权难于理解：这是夺谁的权，这权为谁而夺？广西文革造反组织分裂成不同观点的两派斗争，始于1967年元旦《广西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¹¹人们在社论的号召下，为了表现自己不是走资派，不是牛鬼蛇神，就都在积极地参加造反，参加夺权。当出现意见和观点分歧的时候，也就纷纷地选边站，参加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一派组织中去。两派斗争自此愈演愈烈，几乎无人能置身事外。

当我们串联回到柳州时，柳州的各种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都自称为“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已经在为柳州地专的“一·二五”夺权，和为公安局抓捕老干部刘占云的“一·卅”事件闹得不可开交。开始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组织间的派性斗争。在南宁也已经出现了“砸工总”或“保工总”之争，最终形成了“反韦”或“保韦”之争。

在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和高音喇叭的广播中，无不都在鼓动着：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在中央，文革派们已经夺了刘少奇手中的权。刘少

¹¹ 同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2页。

奇、邓小平等等众多高层领导都已靠边站了，一切由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这上层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底层的群众难以理解。而让群众从中得到的启发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都被打倒了，这天下大势确实是要变了。同时也让群众认识到，这是一场以毛主席为一派，以刘少奇为另一派的两个阵营的斗争。并已经看出，毛主席与中央文革派即将夺得最后的胜利。那么也意味着，过去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的责任，将是由刘少奇一派所应当承担的了。群众对谁该承担责任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既然是错误的路线，就必将得到纠正。这才是人民群众所最终期盼的。人民群众就像是在解放战争中的国共两党之争一样，跟着胜利的一方是理所当然的。也就顺理成章的认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号召夺权，全国上下也就都争相夺权。当然，在夺权斗争中的人们，无不怀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和心理，总的则都摆脱不了争权夺利，为自己捞一把政治资本这个根本。

1月24日，广西军区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开始全面介入广西的“文化大革命”，把广西原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军区支左办公室，向各个部门派出支左部队，担任“三支”“两军”工作。各地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的“革命左派”，对一些要害部门进行全面的军事管制。柳州铁路局也成了最重要的军管单位。¹农村则由各县武装部负责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军队拥有了掌控文革的最高权力，掌握着所有群众组织的政治命运。只要军区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就会马上得势而鸡犬升天。如果军区表态说哪一个组织犯了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这个组织就会马上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各县的武装部掌握着各县的最高权力，下延到各公社武装部及其所控制的民兵组织。

在广西工总发起夺权之初，军区表态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了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于是，其他所有组织也就紧跟其后，展开了全面夺权。没多久，军区又突然改口，指责工总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就掀起了砸烂工总的斗争浪潮。自此围绕着砸工总的问题，开始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工总的人自认为他们没有错，他们顶着军区的表态，坚持斗争，有部分群众组织和学生组织也

¹ 同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5页。

反对砸烂“工总”。而另一部分组织则认为军区支左办公室的意见是代表中央的，肯定是对的，所以也就支持砸烂“工总”。自此，所有的群众组织便开始分化为对立的两派。两派由互相指责，逐步升级为互相攻击，并开始出现小规模暴力武斗事件，形成势不两立的敌对组织。双方都以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作为自己斗争方向的判断标准。

随着让谁（区党委原领导）站出亮相和结合的争论，原来追随军区支左办公室的一派，自然就支持韦国清。韦国清是区党委书记，又是军区政委，自然有权有势，军区支左办公室就在他的掌控之下。又加上3月13日周总理代表中央，要韦国清站出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担任广西军管会主任，这就进一步有力的证明，韦国清在中央、中央文革乃至毛主席眼中的政治形象和地位。支持是相互的，支持韦国清的组织，自然也就得到韦国清的支持，这就是政治交易。

另一派则是支持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等人。这一派原来在“砸工总”的问题上，为了自己的生存，已经和军区站在对立面上，自然就反其道而行之上成为“反韦派”了。在寻找政治依靠的对象时，也只能选择伍晋南等人。然而伍晋南等人原来的地位在韦国清之下，又没有军权，与韦国清的实力对比，显得无权无势，这本身就是“反韦派”先天的劣势，但他们坚信“造反有理”，坚信自己是紧跟毛主席，最终会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自中央要韦国清出来担任广西军管会主任，这就无异于肯定了韦国清在广西的地位，同时也就肯定了“保韦派”组织的性质和斗争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有力地助长了“保韦派”的气势。“反韦派”为此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反韦派”组织了反韦的游行示威，对军区的支左工作也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并于4月22日成立了南宁“422”火线指挥部，之后改为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422”。到了5月25日，“保韦派”也就针锋相对的成立了“525”指挥部，之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自此就形成了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斗争的形式、手段在不断地升级，蔓延整个广西的所有城市、农村。¹

¹ 广西以“保韦”或“反韦”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保韦”派在广西形成自上而下系统严密的广西“联指”；“反韦派”组织的名称比较复杂，南宁市“反韦派”各系统各部门组织名称各异，统称“422”，桂林市的“反韦派”组织有“桂林老多”或“桂林造反大军”；柳州及其他地、市、县“反韦派”组织统称“造反大军”。柳州铁路系统“保韦派”称柳铁钢“联指”，“反韦派”统称“柳铁工机联”。以下为行文叙事方便，凡涉派别区分叙事的均以“反韦派”或“联指派”称。各地“反韦派”组织则以南宁“422”或“××造反大军”称谓。

七

在广西各大城市已经出现的两派对立的形势下，我们的家乡，学校都还没有出现什么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对韦国清、伍晋南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知道韦国清原来是广西区党委书记，而伍晋南是什么人物、身份，则一无所知。听说韦国清在柳州、桂林被群众拉出来游斗，出于本能的对弱者的同情，对他的遭遇我在内心里为他抱着不平，认为他自小就跟着韦拔群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出生入死，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立过多少汗马功劳，他怎么可能是走资派、反革命呢？对伍晋南等人也是如此，我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我对于他们的被游斗，都给以如彭德怀似的，出自内心的同情。

县完中的韦云哉原来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初中学长。他率领着一批男女学生，豪情满怀来到我们街上，并带来了“反韦”和“保韦”不同观点的争论。他们在三都下街的‘底下白坟’（地名）搭起了舞台，表演了一些他们自导自演的，带有侮辱嘲讽性的文艺节目，并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宣传他们的反韦国清的观点。

韦云哉初中时是我们三都中学的学长，就是学校的学生干部，有副好口才，又仪表堂堂，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他出生于本公社偏远的三合大队，是正宗的贫下中农子弟，根正苗红。他对于农民的生存状态体验深刻，对农民的心理也理解至深。所以，他的演讲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说：“这些年来，韦国清作为广西的党委书记，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本主义路线，给我们广西的广大贫下中农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在大炼钢铁时，把我们贫下中农的锅、铲、瓢、盆都拿去炼钢，搞得我们有米都没有办法煮饭；把我们祖宗世代留下的老树山林砍得精光，把所有山头搞得光秃秃的，柴火没有地方要；搞反瞒产、浮夸风，亩产十三万斤，欺下瞒上，弄得我们贫下中农浮肿挨饿，贫病交加，饿殍遍野。现在，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清算他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他们的反，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就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韦国清这样的广西土皇帝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演讲时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演讲完毕，又接着领头振臂怒呼口号：“打倒刘邓资本主义路线，打倒韦国清……！”群众听了他这番演讲、鼓动，再联系自己眼下的政治、生活现状，特别是六零年前后那三年的悲惨生活，无不感同身受，义愤填膺，都认为他讲得有道理，甚至认为从省到县、到公社、

到大队的这些干部都应当对这一切负责。

农民群众并不真正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是直观的，从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去体验，去感受和理解。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苦难，一直没有倾诉的机会，甚至没有人敢于把这一切当成是苦难。他们天天在饿着肚子，却又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忆苦思甜大会，去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去赞美新社会生活的幸福、甜蜜和美满。他们总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去说一些自己不想说的话。现在，终于有人敢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他们不堪忍受的现实提出批判和否定，解答了他们心中郁积已久的疑问，他们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年来，他们百遍千遍地唱熟唱透了《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在街边的墙壁上，在公路边的山崖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好！”的大幅标语，但他们无法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去感受这社会主义的“好”。这些年来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到公共食堂，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是实实在在的饥饿、浮肿和死亡，这样的亲身感受，无论如何与“好”字是搭不上边的。既然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好，那么，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些年来，他们所过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生活。

韦国清是广西的第一把手，这广西的资本主义就是韦国清推行的，自然就应当像刘少奇一样的被打倒了。按这一逻辑，这整个广西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应当是被打倒的对象。老百姓们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思考，从内心深处里期望着能通过这场运动，从这种现状中解脱，但他们又讲不清楚自己所期待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倾向于通过打倒韦国清来达到他们的期望。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只能在思想上成为“反韦派”的支持者。

另一部分人，除了各级的领导者外，主要的就是那些领导者们鞍前马后的忠实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们平时为那些政策的推行立下过汗马功劳，得到过领导们的赞赏鼓励，同时也不少在人前人后，炫耀过自己非同常人的政治地位。他们自恃根正苗红高人一等，他们自认为只要紧跟着这些领导，把他们保住了，自己就有了入党升官的机会，就会获得更大的政治特权，就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假若那层层级级的领导者都被打倒了，他们那一点既得的，可怜的特权也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反而会变成受众人唾弃的把柄，连五类分子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们很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一定要维护领导者的正统地位。这些人就是那些各级的干部、民兵，还有那些平时受干部青睐的所谓的“积极分子”。他们便成为当然的“保韦派”了。

八

开始时农村没有造反组织，分不出营垒、阵线，也就形不成对立。

农村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当权者手中。虽然运动初期，那些当权者也曾被一时冲动的群众拉出来游斗过，由于共同的遭遇，形成他们上下级间同进退、共存亡的利害关系。在他们上下级之间出于共同的需要，他们相互依赖和支撑，还能够牢固的控制着自县以下的各级行政权力。前段时间的夺权，没有上一级权力机关的正式认可，群众对这样的夺权也并不信赖。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的封建正统观念是很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他们看到夺权者与被夺权者都高举着相同的旗帜，山呼着相同的口号，他们认为，这种斗争的输赢自古以来早有定论，最终败北的还是民。尽管当初对当权者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老百姓心中的一些怨气，但是，没有哪一级机关的正式文件宣布撤他们的职，所以，他们的权力还在，他们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在生产、生活乃至革命，还得当然的听命于他们。

当韦云哉他们“柳江联战”来到这里，点燃了两派斗争的火种后，公社中学里在校的学生当中酝酿着不同的倾向。这些年轻幼稚的初中学生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分辨能力，自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给他们蓄积了足够的青春的冲动，他们都在跃跃欲试，极力地想表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革命天赋。在平时学习当中自然形成的革命意识，造就了他们不甘落后的激情，他们把这场运动当着学习和锻炼，当成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践的机会。在一切重在政治表现的年代里，大家都想争着表现自己政治上的成熟。

他们也把这运动当着一场球赛，凭着他们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去猜测这场球赛的输赢，然后把自己的前途作为赌注，他们的政治赌博并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考量，他们只把赌注压在自己认为赢的一方，如果赢了就是赢得了前途。但是他们并没有预料到，这场赌博竟然是以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

三都中学里唯一的一个学生组织，他们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在学校里与一些老师组成的战斗队的斗争中，获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在学校的夺权中，与一些

自认为是革命派的老师组成联盟，成功的夺了权。且他们的夺权也得到了当时公社一级权力机构的认可和默许。他们成为学校的独一无二的实权派。与公社里新实权派自然而然的组成了联盟。

此时，在三都还没有真正的“反韦派”组织，只是在“柳江联战”下到各公社进行宣传鼓动后，才开始形成了一部分群众思想中的反韦国清的观点。三都中学里，原来有一些老师组成的组织，因为孙国光老师的失误而不得不自行解散了。到出现两派斗争时，他们也就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一个教英语的黄绍林老师公开表明了自己“反韦派”的观点，他与各个年级的极少数学生组成了一个叫“新一中”的“反韦派”组织。与背后有实权作后台的“617”难以同日而语。

我和思学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解和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我们都认为这是高层的权力斗争。这样的认识来源于串联中获得的信息。但到目前为止，斗争各方的阵线还不明朗，都举着相同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呼喊相同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根本无从辩识谁对谁错。

但是，从我们看到的家乡的情况，不免令我们有所忧虑：那些原来受领导们青睐的人及民兵们和红五类，依然是最得势的人，他们依然对有权力的领导者言听计从的追随。依然是他们在狐假虎威的抄家、整人。而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依然是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维护着旧的路线，以及干部的权威。正是这些人最热衷于高喊支持韦国清。

那么建国以来，那些错误的政策造成的灾难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这种现象似乎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基于这种忧虑，我们从感情上倾向于弱者——那些没有权没有势的“反韦派”组织。

运动的发展，远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当这场运动发展到需要用鲜血和生命去面对的时候，出于对个人命运和前途的担忧，我们身不由己，无法回避地被卷入其中，最终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选自《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第22章。美国华忆出版，2021。

【述往】

1973-1977: 我的“二外”记忆 (10)

——“开门办学”之四：1975年学工

李红云

时间：1975年秋季学期，9-10月

地点：北京国棉二厂

1975年秋季开学后，我们进行了第四次“开门办学”。这次是在北京国棉二厂，时间为两个月。

此时，邓小平主导的全面整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在1975年的一系列讲话，以鲜明、尖锐、深刻的风格，揭露、批判了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各种表现及其理论根基，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¹

邓小平的讲话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民众中，我也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1975年的暑假，在和一些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谈这方面的事情，谈论一些“国家大事”。这些信息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感到了振奋，仿佛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当时对个人的前途没什么考虑，对国家的前途却格外关心。

当我们来到国棉二厂开门办学的时候，还时常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国棉二厂位于北京市的朝阳区，离二外不远。该厂是1949年解放初期在北京创建的国营棉纺厂中的第二个，1955年投入生产。其余的国棉一厂和三厂离的都不远。三个棉纺厂中间还有一个印染厂。在到国棉二厂后，先组织我们参观了工厂，还有印染厂。

我们这次开门办学，主要是下到车间跟工人一起劳动。与前几次的开门办学不同的是，这次在劳动之余安排了专业课的学习。

¹ 郑谦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60页

与以往的开门办学一样的是，我们需住在工厂。

估计工厂一下子很难安排这么多人的住宿，于是不知是学校还是工厂专门为我们在厂区的空地上建起了临时的活动板房，里面放了上下两层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的宿舍。这种房子有点像现在农民工住的那种彩钢板的房屋，但当时没有彩钢板，使用的材料不如现在。9月份刚住的时候，太阳一晒就很热，后来天气转凉才慢慢好了。但北京的秋天风很大，这种房子到处透风。好在还没进入冬季，还不太冷。活动板房的条件十分有限，没有卫生间和盥洗室，只能去附近楼里的工厂宿舍，好在工厂有浴室，洗澡还算方便。吃饭去工厂的食堂，感觉伙食比学校要好。

国棉二厂当时有7个主要车间，完成从棉花到织成布的整个过程。分别是：清花、前纺、细纱、筒捻、准备、织布和整理车间。工人分三班工作，每班8小时，日夜不停。

我们按班级分到了不同的车间，我们班在准备车间。准备车间的工作是织造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络筒”，把一卷卷小的细纱络成一个大筒。干这种工作主要是接线头，一个细纱锭转完了，赶紧接上另一个。机器在不停地转，人在不停地走，手在不停地接线头，一刻也不能停。这一工种就是“挡车工”，通常一个熟练工人要负责20台机器。最辛苦的就是双腿和双脚，她们一天围着机器不停地跑巡回，一个班下来至少要走15-20公里的路程。我们在时，厂里已经有了那种可以滑动的小车，工人坐在上面来回移动，减少了些劳动强度。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这样，大部分还要靠走路。

棉纺厂的工人中女工占百分之七十，因为很多工种只适合女工干。这种工作不需要太大的力气，但手要灵巧，身材不宜过高。刚下到车间时，在这一点上显然对我们的工作分配考虑不周。一开始，不管男生女生，都分配干一样的工作，都去挡车。但从发工作服开始，问题就来了。

工作服是白色的帽子和白围裙，围裙上有几个口袋，分别放线头和割线剪刀等工具。但工厂就没有男工穿围裙的，更没有适合一米七、八男生穿的围裙。所以男生一律没有工作服。没有怎么办，他们只能穿自己的衣服，线头就挂在身上。一个班下来身上的线头都挂满了，连工人师傅都觉得很好笑。

还有的工作，如“装纬”，只适合身高不超过一米六的女生干，因为这样的

身高适合操作，太高就需要弯腰。可我们有一米八多的男生也分配干这活儿，他们反映，一个班下来，“腰要折了”。问题发现后，给男生都调换了工作。

纺织厂的工作环境是常年高温高湿，很多车间长年要求温度要在摄氏 33-35 度之间，相对湿度要求在 65%以上才能正常生产。噪音和空气中飞舞的纤维是很大的污染，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意识。

我们班所在的准备车间工作环境还是不算太差的，就是噪声不太大、飞舞的棉纤维也不太多。但有的车间就不行了，如在织布车间，织布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隆声和空气中弥漫的棉絮气味在高温的催化下，会让人感到不适。从织布车间出来很长时间都感觉耳边还在隆隆作响，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

而工人们终年要与噪音和高温相伴。

刚到车间时，有师傅带着我们干，教我们怎么接线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我们慢慢适应了工作。我后来可以一个人挡 10 台机器。

“开门办学”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并不难，但最难受的是上夜班。我们要和工人一样从晚上 11 时 30 分上班，第二天上午 7 时 30 分下班，整整 8 个小时，中间有 30 分钟的吃饭时间，会有饭菜送到车间的“四角食堂”。这是唯一一段可以休息的时间。

夜班的时间很难熬。开始时还可以挣扎着坚持，但一天之后人就晕头转向了。两个夜班下来就只想睡觉了。一周的夜班下来人的脸都“绿”了。有同学上班时为了能睡 30 分钟，宁可不去吃夜宵。

在国棉二厂总共上过多少个夜班已经不记得了，当时全凭着年轻可以抗过去。

这次“开门办学”与前几次不同的是，专业英语学习的时间增多了，有老师专门上课，也发了很多学习材料。我保存下来的材料有：

1. A Visit to the Peking No.2 Cotton Mill（参观北京国棉二厂）
2. State Cotton Textile Mill No.17(by Jane Uptegrove, A young American visitor to China)（国棉第 17 纺织厂）
3. Questions Asked by Foreigners When Visiting Workers' Plats in Cotton Mills Number 2 and 3. Peking（外国人访问国棉二厂和三厂工人时提出的问题）
4. At a Cotton Mill（在棉纺厂）

5. Background Material (For Reference) (背景资料 (供参考))
6. Supplementary Material (补充资料)
7. A Talk by Hsing Chi-Feng (2nd year, 2nd Term, 1975,9) (Hsing Chi-Feng 的谈话)
8. Oral Practice (口语练习)
9. Nouns, Verbs, Proper Nouns (名词、动词、专有名词)

从内容上看, 这些资料都是与纺织厂和工人有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纺织厂的背景和概况; 从棉花到织布的整个生产过程; 工人的福利待遇; 新旧社会对比,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 一定要批判资本主义, 还要宣传毛泽东的《鞍钢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有些资料是模拟外国人到工厂参观时和工人的对话, 还有的是模拟工人讲自己的经历, 讲新旧社会的变化, 忆苦思甜。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到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 写的是他在上海国棉 17 厂参观的情况。

除了这些阅读资料外, 还有一些练习资料。例如: 口语练习、问答练习、词语替换练习、复述课文, 等等。目的是让同学们熟练掌握单词和词组, 熟练讲述资料中的内容。

资料中会出现一些日常生活不常用的单词, 像纺织方面的专业词汇, 如: scutcher (清棉机), ring spinning frame (环锭精纺机), 还有好多像“咔叽布”(khaki)、“灯芯绒”(corduroy)、“凡立丁”(velveteen) 都在资料后面作了标注。

这些资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如: 讲到了批判刘少奇、“批林批孔”、“七·二一”工人大学, 还提到了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

大部分资料是老师们为这次“开门办学”专门编写的。

当时为了熟练掌握这些内容, 同学们抓紧时间学习, 甚至下了夜班睡很短的时间就开始看书。老师的教学热情也很高。

对我们来说,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上课学习的场地。有的班到附近的朝阳公园去上课, 有的班在宿舍上课, 还有的班就在厂区的空地上上课。记得我们班有一次借到了工厂的学习室, 里面还有黑板, 那可能是最好的学习场所了。

我记得, 因为宿舍里灯光太暗, 我还跑到工人宿舍的楼道里看过书。

用当时时髦的说法就是“开门办学”把课堂办到农村和工厂去。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实践者。

在国棉二厂的后期已是十月底，北京的天气渐渐转凉。在入冬之前，我们回到了学校。这时距开学已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离开工厂之前，由车间的师傅们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写了鉴定。其实，鉴定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在我的鉴定中师傅写了“掌握技术快”。想起来几年前我当工人的时候，也曾给当时在我们班组劳动的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写过鉴定，不禁生出几分感慨，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如何看待我们两年中的四次“开门办学”？

其实当时全国的高校都在搞“开门办学”。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麦克法考尔、费正清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这种现象：“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教育实验，使大部分学生在1974-1976年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有几个月离开校园，其它大学也如此。”¹

这种作法的结果是什么？

最主要的结果是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本来应该进行的课堂教学大打折扣。

我们的专业英语学习成了配合政治运动，结合工厂、农村、军队的环境教学。工厂、农村和军营都无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定的、适当的学习环境。

频繁的“开门办学”占去了本来就已经压缩的学习时间，学习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学习质量无法保证。

另外，“开门办学”被“四人帮”从极左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发挥，认为“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的教学方法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把阶级斗争变成学校的主课，使体力劳动成为教学的中心，把教育上的问题夸张、歪曲到了荒谬的地步。甚至提出：“广泛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大力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斗争。”²这些都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此时邓小平主导的教育整顿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

¹ [美]R. 麦克法考尔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77页。

²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斗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6期，第42页。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提到了教育工作。邓说：

“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¹

“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²

然而，我们回到学校后的11月，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酝酿开始，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³

11月份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评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刘冰和教育部长周荣鑫。北京以及一些省、市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

那时，大字报的作用是为了营造一种视觉压迫和暴力的气氛。鉴于当时北大清华在全国的特殊地位，两校的一举一动对高校，乃至全国都有着示范作用。因此，到那里看大字报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我们年级被组织去的是北大。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学校的派车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北大。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地方是北大办公楼礼堂西面，有着两棵银杏树和华表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到北大，当时天色已晚，根本没看到北大的校园什么样，看到的只是竖起的高高的大字报墙和前面乌泱泱的人群。为了让人们在夜晚也能看清大字报上的字，还特意装上了照明设备，明晃晃的灯光把那一片地方照的灯火通明。记得那天晚

¹ 邓小平：“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34页。

² 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7页。

³ 郑谦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86页。

上，正有人把大字报上原来用“xxx”代替的人名覆盖，贴上“刘冰”¹和“周荣鑫”²的名字。这意味着这两个人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久后，197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长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是报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反击”的文章，是动员全国人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文章中从极“左”的方面对教育革命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对“开门办学”，文章认为把课堂办到工厂的车间、农村的地头，实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种办学方法的质疑和否定是“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把开门办学说成是“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污蔑。³

文章中给教育部长周荣鑫罗织了“制造和散布政治谣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在教育部成立所谓“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他的一切职权，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⁴

至此，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中断。我们又被要求投入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

12月14日，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7、8、9三个月谣言四起，“在教育界，尤其突出”。⁵这里所说的“谣言”，指的就是

¹ 刘冰（1921年12月—2017年7月）。河南伊川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56年，刘冰同志到清华大学工作。5月，在清华大学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从此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他一直担任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爆发后，刘冰同志被打倒。1970年，才被“结合”进当时的领导班子，任校党委副书记。面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刘冰进行了多次抗争。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同志先后两次与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等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副主席转呈毛泽东主席，揭发被“四人帮”安插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迟群等人的严重问题，被指为“诬告信”，再次受到错误批判，并由此引发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直到1978年，清华大学党委报请党中央批准，给刘冰同志平反。此后，他远赴西北，担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常务副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等。他先后当选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信息来源：“清华校史馆”微信公众号。

² 周荣鑫（1917-1976）。山东蓬莱人。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教育家。1975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獗之时，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他主持教育部，会同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展基础理论教育和研究，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着手全面整顿被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了的全国教育事业。他的做法，把江青反革命集团深深刺痛。1976年4月13日，周荣鑫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1977年，中共中央为周荣鑫平反昭雪，充分肯定其一生功绩。同年8月28日，在北京召开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参加了追悼会。见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周荣鑫/4476246?fr=aladdin>，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6日。

³ 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红旗》，1975年第12期，第3、5页。

⁴ 见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周荣鑫/4476246?fr=aladdin>，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6日

⁵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1997年，第156页。

在民众中流传的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一些讲话。

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的我们，“听话”或“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惯常的思维模式使得我们并不敢公开对“开门办学”提出质疑或不满。但是私底下已经开始对邓小平的整顿和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思考，在关系好的同学中也会交流看法。对邓小平的整顿，我们都抱着支持的态度，对那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已开始表现得不那么积极了。❶

【述往】

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高晋占

1963年暑假，距离高考不到一年了，该加油了，却赶上了河北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

倾盆大雨持续不停，据资料记载，短短几天内，阜平这个冀西山区小县平均降雨量608毫米，胭脂河上游超过700毫米，引起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大沙河洪峰流量高达3380立方米/秒，胭脂河为1914立方米/秒。全县淹死15人，受伤200多人，倒塌房屋1.9万间。

我的家乡小村位于大沙河和胭脂河的交汇处，形似半岛。下游二十多里处的王快水库大坝已经完工，尚未蓄水。这个小村属于库区，必须搬迁，全村的其他住户都已迁走，到处都是残墙断壁。我家没有劳力，无力搬迁，成了该村唯一的留守户，孤零零的一座小土房伫立在一片废墟中。每天夜晚，整个村子漆黑一片，没有鸡鸣狗叫，更没有人声，死一样的寂静。

大雨滂沱，听得见不远处大沙河的奔腾咆哮声。屋顶漏水了，用几个瓦盆接水，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困在孤房中已经9天，靠接雨水勉强度日，只要有点粮食，人就可以活下去。

1963年8月10日深夜，屈身在煤油灯下，趴在炕沿上练习化学题。化学是我的弱项，需要下功夫，否则在高考中将会吃亏。

当我从一道难题中回过神来时，忽然感觉外面的雨声有些异样，向外张望，

伸手不见五指。找到几根麻秸杆，点火向屋外照看，只见四周都是水，很快就要漫入屋内，吃惊不小。按照水库的设计规划，到1964年才会淹没这里，本来打算熬到高考后再着手搬迁，想不到大水猝不及防提前来到，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或消息。事后得知，为了保水库下游，保住海河和天津，王快水库提前蓄水，而且一夜之间蓄到了最高水位205米高。

大难临头，首先逃命，叫醒已经熟睡的小弟，冒雨涉水奔向附近高坡。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我的破家，唯有几件破破烂烂的生活必需品，值不了几贯，却是过日子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点可怜的粮食，也是维持生命的热量来源。赶快找到已经搬迁到山坡高处的乡亲，求他们抢出一点生活物资。

有人在雨中一遍遍呼喊：“XX家遭水淹了！快来救人呐！”凄厉的喊声划破夜空，划破雨雾，在山中回响。

朴实、善良而又贫穷的乡亲们冒雨前来，奋力抢出少量主要物品，眼看水位在迅速上涨，立即着手拆房，抢出房木。这些房木，是我家的主要财产，如果被水漂走，则再也没有能力盖房了。自己动手拆除赖以生存的住房，心如刀割。

天色微亮时，大水已经淹没到半墙，土坯垒成的墙壁被水浸泡软化，几声巨响，轰然倒塌。

黎明时分，大雨停了。当我扛着一根房木，忍着脚掌被扎伤处的疼痛，艰难跋涉上山时，回头一望，只见一片汪洋，房没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家没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想活下去，怎么活？

回味平生，不曾做过缺德事，不曾对不起什么人，不知为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样的惩罚，落了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境地。爹没了已经10年，娘没了已经5年，赖以生存的两间房又没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欲哭无泪。那一刻，死的心都有。

转念一想，如果我早睡一小时，或者大水晚来一小时，则我已熟睡，后果不堪设想。既然从大水中逃了一条命出来，说明天不灭我，就应该活下去。看着小弟依赖的眼神，更应该活下去。虽然只有17岁，已经意识到我是这个家的台柱，不能倒下。

要活下去，每天都要做饭吃饭。锅灶没有了，没有办法做饭。搬来三块石头支起一个破锅，凑凑合合也能做饭。

要活下去，每天都要睡觉。房没了，炕没了，没有地方睡觉。好在天不冷，

大地为床，苍天作被，也能睡觉。刮风下雨时，驴圈、羊圈都可以遮风避雨。

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猫狗都有一个窝，人更需要一个窝。再过几个月，天气就要冷了，没有窝难于生存。要活下去，首先必须盖房垒窝，上学成了不敢奢望的梦想，我第二次辍学了（第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时）。

遭此大灾，没有任何官员过问，更没有任何救济，只能自己救自己。

十多天后，水退下去了，原来的房子，只剩下一堆泥土和矮矮的残墙断壁。扒开泥土，挖出几件没有毁坏的日常用具，清洗一下还能用。之后的半个多月，带着小弟挖房基，把房基石头挖出来，用作再盖房的基础石料。

东山墙房基被挖成一个深槽，我和小弟曲身在深槽底部，埋头撬动一块大石头，忽见槽壁的砂土无声滑落，拉起小弟急逃，刚出深槽，两侧塌下填平了深槽。谢天谢地，没有被埋在里面。

除了自己每日辛苦劳作，要盖房，还必须雇用木匠、泥瓦匠，脱坯、搬运房木和石料还需要力工。虽然是建造简陋的土坯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寻找合适的施工人员，谈施工要求，讲价钱，订立合同，交订金，做监工，为施工人员挑水烧水，检查施工质量和进度，验收付费等等，这些建筑施工中的各个环节一样都不能少。17岁的我，常常感觉脑子不够用。

水库移民搬迁补偿费少得可怜，每间房120元，每亩地60元（归生产队），每个碾子15元（归生产队），房前屋后每颗大树1元，小树2毛。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搬迁费也没有及时发放到位，靠拿到手的搬迁费重建家园，远远不够，只能因陋就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能够自己干的事情，尽量自己出力，盖房过程中还学会了一些木工和泥瓦工手艺。

脚上被扎伤处已经发炎，疼痛难忍，咬牙花了1毛7分钱，买了一包消炎粉，撒到患处很快治愈。这是我18岁前所花的全部医药费。

每日忙忙碌碌，无暇挂念上学的事。将近四个月后，在不远的高处，一座简陋的土坯房拔地而起，虽然还四处漏风，但可以避雨，又可以安家了。有了房，有了家，想上学的念头又萌发了。高三的第一学期已近期末，加把油也许能够赶上去。心一横：上学去！

把家中安排了一下，让年迈的瞎眼姥姥照看小弟，为他们磨了面备了柴挑了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毅然走上返校的路，心中掠过几分凄凉。

往常每年冬季，在王林口南面的大沙河上会建一座临时的草桥，过此桥到县

城只需步行 40 里路。1963 年冬，因为特大洪水和水库提前蓄水，没有搭建这座草桥，只能绕道南路多走六七里路，经倪家洼、崔家庄再翻越一座山，由县城西大桥跨越大沙河，才能返回学校。

漫天大雪中奋力前行，走过北果园村后，又向西走了一段路，觉得该上山了，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看不到路也看不到人，茫然四顾，雪地里只能看到自己留下的脚印（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不熟悉这条路，该从哪里上山，犯糊涂了。好在从山的走势，还能辨别方向，认定只要翻越右手这座山，就能到达大沙河沿岸，就能找到县城。心中有了数，毅然上山，没有顾虑，没有悲哀，只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前走。翻过山脊后，看到了远处的大沙河，心中一阵敞亮，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到了学校，回到了班级，老师和同学亲切的目光，问候的话语，温暖着我那颗孤苦的心。虽然每天都要饿肚子，这个集体也是一个家。只要能够活着，就要好好地活着；只要有学习机会，就应该努力学习。

耽误的课程，奋力自学赶上，把所有的作业用破纸演算了一遍。除作文外，老师从来不要求我交作业，这是高中 3 年的惯例，因为我买不起作业本，只能用破纸做练习。由于高中几年考试成绩突出，两次数学竞赛都获第一名，所以老师们对我这个特殊学生格外开恩。物理和化学老师还安排我单独补做了实验。

某次补做一个电学实验，物理课老师李明智向我说明了实验要求，并叮嘱我做实验别忘锁门，之后就去忙其他事了，实验室中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很顺利地完成了实验，看到 220V 交流电源来自一个调压器，于是突发奇想：我把电压调低一些，会有什么现象？调低电压不应该发生任何不良后果。手握调压器手柄向低端一调，大事不好，所有的电源指示灯和照明灯都灭了，任何地方都测不出电压。我知道闯祸了，不知烧毁了什么东西。

我很害怕，烧坏的设备或器件我肯定赔不起。锁门后，战战兢兢地把钥匙交还李老师，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不诚实。

好几天惶惶不可终日，就怕看见李老师。但是李老师并没有找我麻烦，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李老师教物理课之外，还担任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我知道李老师喜欢我，因为我学习成绩好。猜测李老师在包庇我。

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我为什么闯祸。那时山区供电很不稳定，多数情况是电压太低。为了能够正常实验，李老师把调压器反接，即把输入、输出端对调，

以把电压升到220伏。我降压的操作，实际上是升压，结果把保险丝烧断了。

1964年元旦，我所在的阜平中学高中11班举行了联欢会，同学们或唱或跳或逗乐，表演的节目五花八门，校长到我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用笛子吹奏了一曲“红梅赞”。置身于一个集体中，真好。

7个月后，迎来了决定终生命运的高考。又过了一个多月，1964年8月24日，带着老师赠我的计算尺和数学手册，带着遍体伤痕，背起一个简单的行李卷，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见到火车并乘坐火车，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园，第一次见到楼房并住进了楼房（1号楼），开始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宛如鲤鱼跳入了龙门。

大学的助学金比中学时多了近两倍，虽然仍旧吃不饱，但比中学时好多了，购买教科书和其他学习用品是有保障的，偶尔还可以吃点肉，也能把假期回家的路费节省出来。开始学说普通话，还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开始刷牙、洗澡和理发（班上同学互理），结束了剃光头、不刷牙、不洗澡的历史。这也许就是后来的文革中所批判的“一年土，二年洋”，但“三年不认爹和娘”批不到我头上，因为没有爹娘可认。

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段艰难的岁月，刻骨铭心。几十年后回首往事，心中仍有几丝酸楚。☞

【述往】

折翼的老五届

——从清华学子到阶下囚

曾文龙

—

清华文革老五届，绝大部分是折翼的一代。一场史无前例浩劫，彻底扭转了我们这些生不逢时，本是“学之骄子”的前途和命运。

我不过是一个尤其不幸的人而已。往事不堪回首，国情禁锢语境，围墙内谁也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几十年不想写自己的特殊经历。现在已过古稀之年，记

忆早已丢三落四，再不写就完全湮灭了。

也许，有些校友或因在文革的头两年半积极介入上层政治斗争，或因武斗致



伤人死人，而遭过短暂关押，登记在案。而我很另类：既非“团派”，亦非“四一四”，是基本逍遥派一个，却以思想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个十八年！在狱里悲惨煎熬度日如年，直至“四人帮”垮台三年半多，才平反脱离苦海。并且霉运继续如影随形，一辈子挥之不去。

（从左向右：曾文龙 王大定 蒯大富）我和全国最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同班，还曾睡一床上下铺。蒯追随伟人干了不知多少错事坏事，“四人帮”垮台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十七年，比我还少一年。我们那张床上下铺是价值观一左一右，仿佛命中注定都要坐大牢似的。区别是：我因“四人帮”垮台得平反，他因“四人帮”垮台才判刑。

我为何会遭到飞来横祸？起因就是1966年6月当了几天“蒯派”——清华人都知道“蒯派”这个词怎么回事，可是外人不知道。我一连串的故事，或说事故，由此而展开。

1966年6月22日，化902班“十人小组”在清华大礼堂前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其上签名的十个人中有我。当时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通知我班，王光美要与我们座谈，不料却来了个“假货”，我们提出质疑写成此大字报。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全校师生眼球，工作组与蒯大富6月24日在清华大礼堂激辩一场。

著名的6·24辩论后，工作组宣布我们十个人“反工作组即反党”。这回王光美露面了，把我们严厉训斥一番，然后分别隔离批斗，冠以“蒯派分子”。将我们九个人加上支持我们的王大定，分开押在五个班看管和“帮助”，就剩蒯大富单枪匹马可以继续写大字报对抗工作组。

但形势峰回路转，给刘少奇设了个局的伟大领袖很快回到京城，一挥手让工作组卷铺盖走人。原来，我们一不小心竟卷入到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漩涡中心！

本以为此事会像大家熟知的电影台词：“平安无事咯”——孰料，这“十人小组”的大字报，被蒯司令作为头篇，收编到《蒯大富大字报选》里，此文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国大地，连我在广州的亲友都看到过。又天知道五年后这篇大字报的十个人签名会发酵，对我搞出个如临大敌的“516”审查！

先回顾一下我在清华文革的两年多岁月都做了些什么。

其实文革之浪未冲进清华园的1966年5月，我刚跑完800米为了赶晚自习立即洗了个凉水澡，就突然患全身类风湿关节炎病倒，用药不当，又引起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在校医院一住五个星期，连《材料力学》也未能参加考试。出院几天，即逢文革爆发，清华园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参加了蒯大富反工作组的战斗。随之，被打成蒯派分子。我又病倒了，这次又是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4个++++）工作组还未撤走我就重新进了校医院。

周总理8月4号晚来清华给蒯派平反，我半场顶不住得先回医院。

我感到自己身体太差，没想跟着老蒯再折腾。老蒯那时还出了张大谈“权经”的大字报，我认为我俩人生目标不同，他注定要捞政界，而我是想做学问的人。此后，我完全退出十人小组的活动，他们增加了王大定和史复有，成为十一人小组。

这次住院有个把月，我有时也溜出去到大礼堂一带看看大字报。校医院很清静，是思索的好地方。我开始冷眼看狂潮，首先是对打砸抢抄“破四旧”大毁文物不以为然（对中华文化遗产至今的东西应甄别，即使认为昔是今非的东西，也要保护留作文物让后人参观），我认为这种破坏是把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命”。当听说红卫兵去山东砸孔庙，把我祖宗曾子的墓也挖了，我更反感。这场运动到底要干什么？伟大领袖不是教导我们“凡事都要动动脑筋，都要问个为什么”吗，那么这场运动为什么毛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他又为什么能从中央到地方“踢开党委闹革命”？凭什么可以抛开宪法和党章罢免大部分同僚并批斗？程序合法吗？党内大清洗有必要把我们大学生的课也停了吗？……我产生了不少疑问，并把这些随想简短记入日记，秘不示人——没曾想给自己留下了极大隐患。

身体恢复后，我从1966年10月初开始离校大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领略各地的人文风貌。12月在昆明胃出血，由同学护送回校。第二年又溜出学校三

次，想尽办法把祖国半壁山河看了一遍。这得益于我大二大三时当过工化系学生会干部，曾与系会主席鲍浪策划组织全系同学去十三陵、长城八达岭、香山八大处三次旅游，认识了各年级不少同学。1967年我游了许多地方，都是在别的年级同学帮助下，甚至招呼我到他们家里吃住好多天，大大方便了我。

我对老团老四的斗争不感兴趣，认为两派都是“左派幼稚病”，是如来佛手掌心的拳击赛，不是真正的大民主。放眼全国，文革就是大型绞肉机，从上到下互整互害，谁都说绝对忠诚于毛，至死不敢质疑半点。我自以为当逍遥派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68年春，我第四次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院不久目睹同窗操戈的清华两派“百日武斗”开始。我观看了东区浴室惨烈的攻防战，后来就不忍再去看这种同学间自相残杀的场面。

这时，蒯大富找了我，说：“我老团实力明显大于老四，一定能彻底打垮老四统一清华园，成立革委会指日可待。你总是逍遥，身体不好又想将来分配回广州工作，而将来我大权在握可决定你的分配。所以你现在得为我干一件事，就是为我准备一篇发言稿，等到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那天开大会用，内容是批判清华党委17年来执行的教育路线。怎么样？”我想了想，同意写，但需让被蒯关在牛棚的原校领导、系干部给我提供素材。于是蒯大富把我班的邵凯胜（清华井冈山组织部长）叫来，带我去生物馆。

生物馆里关了几十个人，我看着老团“第二办公室”的看守给他们派饭。认得的所谓“黑帮”有胡健、何东昌、艾知生、滕藤几个，不见蒋南翔校长。他们都脸色灰白很憔悴。

我拟了两个题目：1. 你认为清华17年是否执行了毛的教育路线，举例说明失误或成果；2. 对比解放前老清华的教育质量，你认为优劣如何，举例说明。

邵凯胜吩咐“二办”看守人员以后把老干部写好的材料拿给我看。

大部分时间，我们好几个人跟着物九的戎月莉学太极拳、太极剑、初级刀、查拳，过得很愉快。直到工宣队进校，蒯大富未能打垮414一统清华，我也未动笔为他写这篇就职演说稿。

我一直盼望的复课，空等了两年多。捧着伟大领袖所赐芒果的工宣队占领清华园后，奉旨将全部老五届学子作为处理品匆匆毕业打发走，我的清华学业从此

终止。后来不让考研究生回炉，一生就此定格。

1969年元旦，我赴广西最大的制药企业报道，在南宁制药厂当工人。我一生的快乐时光随六十年代戛然而止，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代正张开虎口扑面而来。

1970年春，不记得是一月还是二月，仅凭《蒯选》第一张大字报上有我的名字，清华学府的掌印者迟群、谢静宜，一纸公文去函广西，要求将我作为清华“516”重要头目清查。南宁制药厂革委会主任和三个军代表，立马成立专案组对我专了政，抽调十几个民兵全脱产，日夜荷枪（开头还实弹）轮值。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勒令我交代与蒯大富都干了些什么！

我和蒯大富交集的事情就那么几天，屁大点事，写了一页纸就再也没什么好写的。蒯成为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就睡在别的地方，我逍遥派一个，千真万确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

专案组跑了几趟北京，没查出我有何问题，但不肯放过我，从第二个月起，让我整年在几个民兵监管下天天挖防空洞，星期天再加上工厂里十来个“422牛鬼蛇神（骨干分子）”一起干。对我的“516”审查关押，历时竟长达14个月。后来才知道，对化902十人小组其他同学的审查半年就结束了，而广西山高皇帝远，迟群、谢静宜早就把我忘了，才不管我的死活呢。荒唐的是：十四个月后，南宁制药厂专案组才想起要到清华问问怎么搞下去，回来突然就放了我，叫我像以往那样正常上班。

“516”审查结束，却居然不给我做个否定结论！三个军代表不明不白写了句：“此人经‘516’审查”，就塞入我的档案袋，像如来佛的五指山压住孙悟空，要镇个500年。——被“516审查”，竟这样莫名其妙成了我“历史污点”，黑我一辈子。我真比窦娥还冤啊，我真的至死都不会明白这“516”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从恢复自由重新到车间上班后，我每年返广州探父母都极力去找单位联系欲调走。而好几年，一次又一次原本都说好可接收我的单位，总是调档案去看后就退。终于有人告诉我，档案袋里有这么个东西：“经516审查”！

这还只是办调动所碰到的阻力，以后几十年，还不断遇到“此人不能重用、提拔”的阻力。

我找南宁制药厂政工科论理，他们推脱：“你的确被审查过。又没说你是‘516’。”

现在军代表走了，我们无权拿出来。”

厂革委会主任于青槐，是原来在监狱管劳改犯转业来的军官，对所有职工都凶巴巴的，职工背后都叫他“土匪”。我血气方刚，敢当面顶撞他。这家伙很记仇，总阻拦着不让我调走，明知我体弱多病，还年复一年地尽让我干重体力的活：仓库搬运工啦，拉锅炉扒出来的热炉渣去填水塘啦，挖防空洞啦……累得我不到三年就胃出血四次，连在清华的岁月，我一生总共8次消化系统大出血（3个+号以上的）。

很多群众对我很同情，生活上给予各种帮助，劝我不要硬碰。

有个很同情我的工人，带我到几十里外的武鸣县农村，介绍我认识一位40岁左右的奇人黄某。黄大哥热情地接待我，同意医治我的胃溃疡病，并只收了我很少礼物。他给我服用了三剂药（每剂不同），就真的神奇地把我的胃病根治好了。时至今日，四十多年随便喝酒吃辣及以前不敢沾的食品如萝卜、榄角、酸菜，都再没半点复发。黄大哥是个农民，其实不会看病，必须拿医院确诊是消化系统溃疡的病例，大出血过的，他才给治，但保证治必痊愈，永不再犯。除此之外他也不会医治别的病。他的师父要他立誓不得外传，临终只传子。后来听说他没来得及传子就意外车祸，不知世间是否还有此绝世秘方？

他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否则我那老胃病肯定挺不过不久接踵而来的严酷监狱生活，早就人命危浅呜呼哀哉了。

二

努力几年想尽办法调动都走不了。我的霉头越来越重，终至深陷囹圄。文革绞肉机要吞噬谁，连国家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都不能幸免，我小民一枚当然厄运难逃，唯无可奈何受碾压。所以我后来很佩服“六四”去国的万润南，那是自保唯一之路。

广西是文革重灾区，韦国清的土皇帝地位一直稳固，他对“422”派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毒辣。什么揪出“反共救国团”，炸水库决堤坝淹死大量躲在地道的“422”群众，出动正规部队用坦克、重火器剿灭“422”武斗人员，不惜把南宁三十几条主要街道轰个稀巴烂。我刚去南宁时看到的废墟景象，有如电影《攻克柏林》大结局，地上还到处血迹斑斑。广西不但多处地方发生将“地富

反坏右、造反派”全家灭门的惨案，还要吃人肉、心、肝，生殖器泡酒喝……真是惨绝人寰！我亲自问过两名吃人者：“你有人性吗？不知道这是犯罪吗？”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是阶级敌人，我吃他们何罪之有？你什么立场？”

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总有不少人死在沙滩上。

我在南宁已很注意对广西两大派的事情一概不表态，但由于清华的老团、老四以前到广西串联都一律明确支持“422”造反派，所以广西“联指派”和韦国清都十分痛恨清华大学出来的人，我躺着就能中枪。

1975年12月，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到广西，厂政工科背后让职工揭发我的日常言论。被吓的个别年轻职工说我在跟他们喝酒时，他们谈到文革打倒许多将帅、高官的事，我讲了一句成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政工科马上成立专案组，上纲上线为“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于是开大会宣布把我隔离审查，关在厕所旁的房间，蚊蝇多得差不多可以把人抬起来，民兵在外站岗日夜严密看管。

上次“516”审查只是要我交代与蒯大富干了什么，没搜我的东西；这次不同了，强行把全部物品仔细翻遍。不但拿走日记、笔记本、信件，还顺手牵羊把我全部邮票取走，没写清单。我从8岁跟别人开始学集邮，不但拥有1949年后的很齐全好品相的票子，而且拥有清朝邮票四五十张（不敢集国民党时期的邮票），其中“慈禧60大寿”和“宣统登基”两套是我最珍贵的新票——后来平反，这些价值不菲的邮票就通通没发还给我，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今天可是几百万以上的财富打了水漂啊。我现在重新收集1949年后的邮票，再也无法集齐全。

这下一“抄家”，我的日记里曾断断续续记有的对文革的一些“随想”便曝光了。

政工科整理成材料上报，而姓于的“土匪”与南宁市委第三把手肖寒（他女婿颜景堂是广西“联指”派的头领）是同村人，更亲自直接把材料送肖寒家里。肖寒转呈韦国清。这样，我被韦国清选中作为广西批邓的头号活靶子，写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党委批邓文件往下发。1976年4月初，公检法对我正式逮捕，关押到南宁看守所。

我被带上“邓小平在广西的代理人”这成吨重的帽子，轮番拉到省市直属机

关和工矿企业，挂大牌子并“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人们高呼口号总是第一句“打倒邓小平”，第二句“打倒曾文龙”。

当时公检法合并，审讯过场的形式是这样的：公安两个人问“这些物品是不是你的？”就要我在笔录上画押，历时仅10分钟；然后检察员一个人来复核，更快，几分钟完事；审我的法官是个女的，也只有一个人，问话约半小时。这就是文革时期的司法程序。后来问其他犯人，他们说你这样快走过场是好事，没尝过稀奇古怪的刑具是很开恩的了。

我面对法官，不承认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诛杀开国功臣”，在我日记里写有的东西我承认，但强调是个人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疑问，从来没向外传播过。我在清华大学几年，连两派都没参加，自出娘胎更没有做过任何实际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根据宪法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公民权。

法官斥责道：“你吃了豹子胆！连毛主席都敢攻击？你不承认含沙射影？可我有证人物证，就能判你。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他一个脑袋顶我们六亿个脑袋，难道你自以为比毛主席还聪明？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这就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所以，你不能享有宪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说“这不符合逻辑，应先有宪法保护我的公民权，而不能先定罪再剥夺我的权利”。

法官说“少废话。告诉你，以你的罪行，我完全可以枪毙你!!!我还是认真了解过，你出身很好，社会关系也清楚，就手下留情只判你个十八年，好好改造吧。”

我说不服。她说“我们把你送去该去的地方，你一定会服的。审讯结束。”然后她按了一下铃，叫人把我押回看守所。

8月23日，召开了南宁市十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刑期18年。四大罪状：1.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为被打倒的走资派鸣冤叫屈；2.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3.丧心病狂攻击江青“想当武则天”；4.与邓小平一唱一和，攻击文艺界只有8个样板戏“一枝独秀”。

宣判后，两辆大卡车站满了军人，手持冲锋枪，押着五花大绑的我，在南宁主要马路游街示众了一大圈。挂着沉重木牌子的铁线，把我的后脖勒出半个月还

深深一道血痕。

我就如此从清华大学的最高学府，无端跌入苦难深重的囚牢，不禁泪如雨下……只能叹时也命也运也！

三

在游街示众的车上，闭目回忆起1963年，我以广州高考榜眼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状元是物九的唐孟希）。大一，我入学即被任命为化九五五个班的“年级总学委”，亦曾壮志凌云，希望学成后能为国家的原子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化九、物九，是1963年入学、1969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六年制）

我父母都是纺织工人，家族所有亲戚关系差不多都是产业工人，而且都从无出过政治问题。以共产党的阶级成分论讲，是所谓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大一时我还曾一度被辅导员们挑去听党课，列为年级第四号培养对象（王连生、段德智、葛汝明三人很主动，上学期即成预备党员）。

再回想到我的中学——广州实验学校，即南武中学，建校比清华大学还早，师资雄厚，学风严谨，我深得其益。那时文史哲数理化我都喜爱，唯从小孱弱不善体育。我由小学到高中，都是学生干部，如团支委，学生会宣传部长、学习部长等。总之，文革前我是老师们都寄予厚望的好学生，认为将是“政治、业务双肩挑”大有前途的好苗子。

广州在中国近代史是个风云激荡的地方，涌现过无数思想家、革命家敢为天下先，这熏陶了我喜欢分析、质疑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成败祸福。

文革前，我第一次捅的娄子是被叫去听党课，就碰上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导要绝对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不知天高地厚，讨论时大发议论说：马克思教导女儿要“怀疑一切”，清华学子如果只知盲从不敢突破怎么会有学术新发现？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新。党史也告诉我们曾有过几次重大路线斗争，说明领导不等于永远正确，毛主席就没有盲从，还叫我们“凡事要问个为什么，想想是否有道理”，这“做驯服工具”提法很不科学。——主持党课学习的年级辅导员吴福祥马上把我拉出室外，黑着脸叫我以后不要再来听党课了。后来化九年级陆续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吴福祥却不再理我。（吴辅导员文革一结

束就跑到他原来最憎恨的美国去了，听说现在明尼苏达大学。)

我那时倒觉得入不入党无所谓，真的一辈子没再考虑加入这个要无条件服从的组织。我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天，我们化902的班主任曾宪舜找我了解情况。可能是同宗关系，比我大十来岁的曾老师一向对我很好。我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批评我，只笑着说“看来你是当学者的料，不是当官的料。”几十年来我视曾老师亦师亦友，每次出差北京都必返清华园见他。

我那时为什么对入党没兴趣呢？是由于我有了一个梦——大一上学期，我突发奇想，欲探究科技进步在中华民族兴旺过程的作用，去清华图书馆翻阅借书目录，发现只有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单专业的学科史、工艺史等方面的书，却没有一部全面综合阐明整个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著作。我暗自兴奋，不知天高地厚，立志要收集资料，写成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心想除学好核化学专业，我这辈子就要写出这部书。我那时认为只要内容翔实全面，观点基本正确，即使水平不逮，在这领域由我开创，就可扬名立万了。我开始抄录、做卡片，记录重要参考书刊的索引，构思写作框架，还每期必读图书馆摆出的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我这时把我心中这个目标告诉了曾宪舜老师，但请他为我保密。我听说清华图书馆每个寒暑假都会雇一些学生打小工，搬书腾库、登记新书、贴借书袋、修补破旧等，还给点零花钱。我请曾老师介绍我去图书馆做假期小工，以便进里面找我要看的资料。曾老师一口答应，说正好我们工化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女儿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他领我去见了小滕老师。

这样我连续三年寒暑假都没回广州老家，留在清华园为实现我的痴心梦想做准备。我在图书馆找到不少我要看的书，特别是发现北宋有个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几十卷，把我国宋代前的科学技术发明已做了大量地搜集和整理，并且他自己有不少研究新发现，令我惊奇和钦佩不已！我知道以后要多读书多跑地方考证。

我那时想：我国的伟大发明岂止“四大发明”！何况指南针只对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立了功，火药更被西洋人利用把我国打得割地赔款，都算不得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荣的最伟大发明啊。反不如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烹调技艺、中医和中

药，以及文房四宝和活字印刷术等，对我们种族兴旺和文化遗产更为重要。我们的祖先，连神秘的人体经络和穴位都能发现，圆周率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煤和石油都是我们古人率先使用……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但为什么中国涌现过诸子百家，却没有形成希腊那样成群的科学学派呢？为什么后来更科技整体掉队，远远落后于西方，如今只有追赶和模仿的份呢？是什么根本因素，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我认为研究科技发展史最重要的是探索这个问题。自由思想，才是科技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文革来了，我们被迫全部停课，图书馆关门，我的梦戛然中止。

到八十年代，已回到广州工作的我突然在新华书店发现英国学者李约瑟出版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皇皇巨著，我犹如被人当头一棒。我草草翻阅了一下，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条件像人家那样做学问，前思后想彻底死心了。我回家把历年的笔记付之一炬。从此便没有了梦。业余集中精力去当星期六工程师，挣钱养家。

四

监狱，对于作奸犯科的刑事恶徒来说，或许是改恶从善的地方；但对犯思想罪的人来说，却无论古今中外俱适得其反，让受害者更勤思索更趋觉悟而已——因为真理从来都不是压服的。

我在看守所待了四五个月，然后押解到了广西第一监狱，即英山监狱。那里关的全部是刑期15年以上的男犯，有一万二三千个犯人左右。四面环山的盆地，十几米高的围城，上有电网和机枪，军人全天候严守。有两次发生犯人逃跑被打死，要我们端着饭盒排队一边吃一边看，犯人都是被开花弹打死，或内脏大翻开，或半片脑袋炸飞，狰狞恐怖。所以，别想逃跑。

犯人一进监狱大门，就得换上拼缝得极难看的防逃囚衣，原自有衣物通通焚毁，我平反离开时，都只有穿着此囚衣，一路在鄙视的目光下回到家。

犯人全月伙食费仅仅只有5元，包括定量45斤米及全部伙房开支。长年累月一天三顿只有盐水腌白菜或南瓜佐饭，食毕饭盒扔水池也飘不出半点油花。每月杀一次猪，人均一两开斋。逢春节国庆中秋加点冻肉厂拉来的积压内脏、小鱼，都吃得津津有味。平时能抓到昆虫挖到蚯蚓逮着老鼠，绝不浪费。我们整天都觉

得饿。

另有2元入账本登记，每月都有一天由管教干部带两个已服刑多年的老犯人出去集中为各人购买牙膏肥皂、火柴香烟、纸笔信封等，不能买食物。半年可写一次家信，必须叫管教干部先看和收发。

约五六十犯人编为一个中队，睡上下两排大统铺。早上6点吹号起床劳动，晚上10点关灯睡觉。每晚饭后开会，背诵《监规》并自查，然后众人批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每周一次轮流报罪状并认罪自批。每三人编成固定一组，不论何时何处三个人都必须一起行动，包括寒冬夜大小便，也得三个人一起跑出百把米外上厕所。一个政治犯要指定两个刑事罪人做“同伴”，理由是刑事犯只危害个体，政治犯却危害全社会。

初来乍到，要背熟二十几条“监规”，强调必须认罪伏法，好好改造。

我从一开始就只肯“伏法”，不肯“认罪”。第一次轮到我自报案情，我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是准备为国家搞原子弹的。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两派都没参加，没干过任何坏事，我认为我只属于思想认识跟不上，不是犯罪。”这下子，把所有人都听得眼睛瞪大了许多！这监狱从来没人敢公然不认罪。几个管教干部马上喝令我“闭嘴！”然后让大家批判我。但没有发生殴打我的事情。

批判结束，我两个“同伴”警告我，等着关“单监”！

第二天一早，其他犯人排队去工作，单独留下我。有两个管教干部领我去监舍最偏远处，那里有一长排暗无天日的小笼子，每个笼子关有单个戴着手铐和沉重脚镣的人，饭从小洞塞入，几个月没有放风没有洗澡，大热天头发长长，肮脏不堪形如鬼魅，很吓人。

管教干部问我：知道违反监规、不认罪伏法会怎样了吧？我答：我不会触犯监规，但我不会认罪。居然没锁我，把我带回其他犯人劳动的地方，叫那两个“同伴”看紧我，就没下文。大家都非常惊奇，说我够特别的。

过了两天，王副监狱长单独和我谈了次话，然后说他会去南宁法院了解情况再说。大半个月后他找我说：“法官向我交底，你的案子是韦国清亲自拍板定的，改不了；由于你不肯认罪，法院派人和我去了你家，要你父母签字，你父母也不签字，说你想为国家搞原子弹才考去清华，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现在对你也同情，但我们是看牛的，法院叫杀谁就杀谁，就放谁才能放谁。”他压

低声音说：“北京上头有了新变化，江青那几个叫‘四人帮’的被抓了，你的案子或许有转机，说不定很快平反，或有特赦的一天。但我忠告你，未释放一天就老老实实遵守监规一天，不然没好结果。我明天让你转到技术室，与图纸打交道，既发挥你的专长，也不那么辛苦。”

一年过一年，我到平反出狱再没见过他。但我得到安慰，他是个有良知的人。

我每半年递一次《上诉》，“四人帮”垮台已三年，韦国清还一直坚持喊“广西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是没有胡耀邦，文革无数的无辜犯人无论怎样申诉都只能沉冤不雪。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监狱一万几千个犯人，除少数人派去种菜外，其他人分成很多工种，从浇筑到总装，生产一种六缸V型船用柴油发动机，每天都有十几卡车的成品运走。后来还自行设计增加生产一种重型卡车。技术室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的犯人，跟着一个刑满留场的老工程师，从设计、描图到编工艺等，负责全部的技术资料。我们离生产区远远的，平时管教干部不来监督，午饭后还可趴在制图板上睡半小时。

我的“同伴”说，“劳改了十几年，看见不认罪而不被关单间还优惠工作的只有你，再就是××中队那个林泰，就你们两个人啦。”他们偷偷带我去“串监”，认识这位另一个大队的特殊人物。

林泰，就是电影《英雄虎胆》主角曾泰的原型，任柳州市刑警大队长，因“吹捧邓小平”，判15年关进来了。他更硬气，不但不肯认罪，而且任何劳动都拒绝干，在监舍里自由自在的。我从他那里听到了美丽的阿兰小姐与他真心相爱，帮他完成任务的故事。结局是林泰虽然成了被周恩来授勋的“新中国十大侦察英雄”，而极左的顶头上司不但不让他们结婚，反而秘密把阿兰小姐枪毙了，阿兰小姐不是传说中的死于自杀。林泰从此神经变得有点不正常。

更令我感慨的是，1979年11月底我无罪释放时，比我还早一个月拿到平反判决书的林泰就是赖着不走，要求派飞机送他去北京见邓小平。他后来如何，我就知道了。

监狱里三教九流、各路神仙和妖魔鬼怪，构成特殊的社会生态，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的人渣就不去说它啦。在这里，因文革是造反派“422”各地的头目干将的，被关不少。“422”总头头熊一军找到我，原来他的妻子是我在南宁制药厂的同班组工人。因政治言论不当的犯人特别多。还有收听“美国之

音”的，甚至用印有老毛头像语录的报纸擦了屁股的、失手跌碎伟人石膏像的、老毛死时去买红布准备结婚或试剪囍字的，自己生日家宴被举报及不合时宜聚众吃狗肉的，均犯“涉嫌庆祝”罪……如此这般“莫须有”入狱的很多很多。技术室就有个大学毕业生，下班回家看见笼里的鸡有点蔫就杀了吃，马上五花大绑，以“幸灾乐祸罪”判15年，妻子离婚。他神经兮兮了，每过不久就自言自语……。一人离世，也要无辜累及华夏苍生多少家破人亡！这个世道正常吗？

我估计后来英山监狱拨乱反正的案子会有一半人，因为仅1976年下半年的犯人就激增五六千人（开大会可见），非刑事犯居多，英山监狱已呈人满为患。

英山监狱里没有任何报纸杂志及广播，听不到任何外界信息，更不像老蒯坐牢那样不用劳动，每月吃45元伙食，还能看电视、学英文。广西监狱图书室唯一有的是马恩列斯毛的全套著作。我可能也是唯一耐心通读了这些书的犯人。我发现马恩每本书的扉页那句“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在中文全变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有玩味之处；我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论根据是商品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创造，而不考虑提供厂房、原材料、运输、管理等资本成本，是否正确？我发觉恩格斯晚年在修改马克思早年的主张，从巴黎公社的革命转向议会斗争夺取政权……；从列宁断言资本主义世界已到垂死挣扎阶段，为何几十年东风还压不倒西风？中国历朝历代肇始，统治者都安抚百姓，休养生息，为何老毛要“不断革命”，一批批地将自己人陆续地打成敌人，推向对立面？……我想，出狱后要多看近代历史资料，研究两个世纪以来深深影响全人类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白坐这个牢，我要做个明白人。

我在监狱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

某天，我小腹剧痛非常，完全不像过去的胃疼。便向管教干部报告。在我的“同伴”陪同下，到监狱医务室看病。那个医务室只有10平方米面积，只有一个中年犯人吴医生，也只备有简单的治疗感冒、拉痢等小病的药。

吴医生一检查，即诊断我是急性阑尾炎，马上要开刀。他让我等着，自己去监狱外领取手术器械：一把手术刀、一把手术钳，缝针和羊肠线，碘酒和酒精、纱布和药棉，还有一小包止痛药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就在这个没有消毒的房间，没有麻醉药，没有助手，吴医生给我做了约一小时的手术。没有麻醉药，他就用纱布包裹着短木棍，让我咬紧不松口（防止因痛

咬断舌头)，又用布绳子把我捆在病床上（防止因痛手乱动）。他安慰我说，他原来是有名的外科主任，做过无数盲肠手术，叫我放心。条件如此，必须病人配合。

我在体验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滋味下，吴医生的确麻利，落刀准，很快地取出我已变黑的盲肠，让我看了，说再耽误你就会腹腔炎感染死亡。他很快缝好伤口，给我服了止痛药。手术很棒，愈合后只留下浅浅1.5公分长的疤痕。

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说“有次碰到一个女病人非常漂亮，实在忍不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忍不住笑起来。他马上制止我：“缝线有限，你把伤口笑得崩开，我没法儿救你。”

我又从鬼门关脱了险。

五

1979年11月底，失去四年自由的我，终于重见天日。那时，户口、粮食关系和档案，把每个人管得死死的，我不得不回到南宁制药厂上班。判刑时全市声势浩大，平反时悄然无声。

中央有文件要给我这样的文革冤假错案补发工资，可拿回两千五左右。厂政工科说，这几年你不在我们工厂上班，你问法院要；而法院说，广西穷没这笔钱开支，你向中央要。还居然威胁我：“还要工资？邓小平再下台再抓你”。

讨薪无果，我气得给邓小平写了信，当时没复印机，我去照相馆把平反判决书拍成照片附在信里寄去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了信，让广西新掌门人韦纯束处理，于是我去找了韦纯束，见了一面。这一闹，才拿到我应得的工资。

我向韦纯束提出第二个要求：调动工作回广州。法院说的“邓小平再下台再抓你”，是我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说他很忙，以后再办。后来，我再求见韦纯束，均被挡在政府大门外。

又过去了一年，我心急如焚。

我仍是单身汉一个，有大把空闲时间，我发现南宁有几十个清华校友，于是心生一计：广西当局不是忌惮清华两派都支持“422”吗？我干脆把清华人都串联起来，成立个校友会，也许……

我怀着不纯动机花了许多时间真的把广西校友串联起来了，一打出名册，达150多人，最老是1933年毕业的广西大学尹教授。我写了封信给韦纯束，送到

区政府传达室，告知我要召开清华大学广西校友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附名册一份。结果，第二天我外出，下午才回到厂宿舍，门卫说广西政府办公厅主任在我宿舍门口等了足足五个钟头了！他要我取消成立清华校友会，我拒绝了。他说你明天来区政府，韦主席要见你。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韦纯束。他说：“你不是想调动回广州工作吗，我与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有交情，可以帮你解决。你取消校友会好吗？”我说“过两天就开会，全体清华校友都通知了，校友会是清华人互相联络感情的组织而已，要取消没理由，我只能不发言，交给别人发言。反正我能回广州，你就不用担心我利用这个校友会让你不放心。”韦主席点点头，吩咐办公厅主任打电话叫南宁市组织部长过来，同时当面写信给梁灵光，还读给我听。然后交给蓝部长让他买机票即去广州办理。

终于，1983年2月在两个省长帮助下，我回到广州。梁省长经广东省医药管理局田局长把我安排到广东省制药工业公司，干到退休。

我高兴得昏了头，竟忘记要求韦纯束把我的档案袋清理干净。

“经516审查”这句话威力很大，后来制药公司和管理局考察干部时，曾派办公室丰子义主任去南宁、去清华调查，也找不到我有什么问题，又弄不明白为何留下这句不明不白的“历史污点”。丰主任告诉我：“你出身很好，能力也强，但不敢提拔你。我知道你很冤，没办法。要不你写个入党申请，我愿意做你介绍人，也许你入了党能改善一下政治状况。”我拒绝了，我无端被弄得这么惨，什么党派都不想参加。

我39岁才调回广州，急急忙忙开始恋爱，闪婚，40岁有了个儿子。这把年纪了，考研失利，出国无望，庸庸碌碌仅为稻粱谋。在家我是长子，父母对我期望最大，我在整个七十年代的离奇遭遇让他们十分担惊受怕，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亦唯有加倍尽孝。

我刚调回广州时身体颇虚弱，听从养蜂的堂兄劝告，坚持每天服用蜂王浆，坚持体育锻炼、注意保健养生，慢慢地强壮起来了。近35年来除补过牙，再没看过什么病，隔年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算是大难不死之后福吧。我至今还在工作，按蒋南翔校长和马约翰教授的要求，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了。

六

我在清华文革期间是个逍遥派，老团的头头认识一些，因为他们常常到我班宿舍，而老四头头则全部不认识。我回广州工作后，可能有些校友把我的不幸经历传开了，两派的干将纷纷与我结交。如汲鹏、唐伟、周泉纓……，还有著名的广东造反派武传斌，蒯的好友北航韩爱晶，都与我吃过多次饭。唐伟还带我去深圳大学看望了罗征启学长，时隔“六四”风波不久。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老团老四的派性还对立严重，互相攻击。周泉纓就是例子，曾发誓不与蒯见面。适逢一个机会让我为两派和解作出了一点贡献。

那时，汲鹏任康华公司南方分公司老总，他知道我与广东省四百多家制药厂熟识，要我找一家大型制药厂合作生产天然食用色素（清华大学化学教研组研究的课题），出口日本。我给汲鹏办好了。刚好刑满重新回宁夏青铜峡铝厂上班的蒯大富，由我一个也在该铝厂工作的中学同学（人大毕业）彭某联系上我，给我来信说，他与罗晓波一见钟情，认识24小时即决定结婚，打算旅行一趟要经过广州。我灵机一动，找汲鹏商量：“现在清华派性严重，你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两派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作出表率。你拿钱出来给老蒯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请广州的清华两派都参加好吗？”汲鹏果然爽快，立即同意出资5000元（当时我月薪61.5元），要我实际操办。我先找到广州校友会秘书长列曾彪，让他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校友当主婚人，我和列做证婚人。再请来清华老五届的两派同学，在豪华的花园酒店为蒯罗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连喝两天喜酒，最后一顿是到著名的蛇餐馆吃蛇，把5000元全花光。汲鹏因此事被邓朴方狠骂并处分，我很过意不去。

这样一来，广州的清华两派群众迅速消除了派性。后来我还成功把蒯与唐伟、周泉纓都拉在一起吃饭，很融洽。

蒯大富和我私交是不错的。但我俩在三观方面却是对立的。他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得宠的“光辉岁月”，不知他是真顽固，还是“不得不毛左”？我和老蒯，和周泉纓都争论不少。看来，文革两派的派性可消除，但国民的价值观对立就难以统一了。

我对祖国未来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好多年前我在化九同学聚会时就打过比喻：黄河九曲十三弯，总的大方向是向东，虽然从兰州附近入河套地区或曾流向

北（以俄为师），但出潼关后还是要向东奔腾的。后来看到杨继绳学长也说过相似的话。我非英雄，但所见略同。

我在化九微信群说：对历史，你走得太近看，它差不多是直线；你离远看，它其实是上升的大螺旋。☞

2018--2020年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